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4月30日第11期 总第22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21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九）

【专稿】

谭守香 从“北大红卫兵”到“红旗飘”

蔡鸣乔 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

——我对北师大“4.26事件”的几点看法

【评论】

周家琮 胡适“史家想象力”浅释

——兼评胡鹏池“蒯大富二见吴德”的推断

樊能廷 读报小识

——评新北大公社“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的《严正声明》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三）——矛盾升级“414”高调登场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三）评注

【述往】

俞小平 我在文革中的三次“被告密”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三）

——火烧英国代办处·批斗日共代表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六）——让人揪心的世道

【文摘】

聂元梓 我在文革漩涡中——清查“五·一六”运动

【本刊声明】

【专稿】

从“北大红卫兵”到“红旗飘”

谭守香¹

我在1966年9月“北京大学红卫兵”成立后认识了牛辉林。我们共同经历了从“北大红卫兵”到“红旗飘”的过程。

1. “北大红卫兵”的成立与瓦解

1966年5月25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刚一贴出，立即遭到全校占多数师生的口诛笔伐。一星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人民日报》转发。那时的学生都很质朴单纯，只要中央表了态，无论自己是否想通，首先是拥护，然后是检讨表态，这叫“紧跟”。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来北大组织辩论会，赶走了工作组。于是，聂元梓和“校文革”成了北大当然的主宰。设立“校文革”、“系文革”、“班级领导小组”这样的组织体系，一统北大的“斗批改”。虽然大字报上也出现了一些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但都并未脱离“校文革”的体系。

“8·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此后，北大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学生红卫兵组织。九月，成立了全校统一的红卫兵——“北京大学红卫兵”，是在校文革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大会在“五四”操场召开，牛泰升执大旗，牛辉林讲话，校文革派要员姜同光祝贺。牛辉林是“北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我听说过“5·25”牛辉林是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因为大字报中提到法律系的事，说“法律系是黑典型”，所以看了大字报的法律系师生一致反对这张大字报。据说聂元梓大字报刚贴出，牛辉林在校园里同学的集会上发表批评大字报、保党委的演说，感染力很强，

¹ 此文作者原为北大西语系1963级学生。

许多人含泪聆听，掌声口号声响彻三角地。

九月中下旬，我被推荐到设在哲学楼的“北大红卫兵”总部。报到后我才知道，“北大红卫兵”从一成立，就是一盘散沙。“8·18”以后，全国掀起一股大串联的高潮，外地学生大批涌进北京。北大的学生，包括红卫兵的头头和“总部”各组工作人员，也几乎倾巢而出到全国各地，办公室只剩下一个人。北大统一的红卫兵成立时，在外地串联的同学，压根儿不知道“北大红卫兵”是怎么回事，我回到学校也不知道谁是、谁不是红卫兵。看到的学校，整天是人山人海，十之八、九都是外地学生。我才来几天，办公室留守的的同学也要走。他告诉我，“有事找牛辉林，他没走”。我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他。

我每天面临的是没完没了地接待外来“取经”的学生和老师，也有一些省市派来搞“动态”的干部。发点传单和“大字报选编”就打发了。有些杂事很棘手，如中学红卫兵破“四旧”，把一些教授家的衣橱贴了封条，天凉了，不敢开封条取衣服；南方来的学生衣服少，睡在教室、食堂里的人，没有足够的被褥；等等。没办法，我就到处拉人帮忙。那时候，同学们都很热心，他们也愿意以主人的身份接待客人，帮我，也帮助外地客人处理了不少实际问题。

牛辉林终于现身。那是一个晚上，他从楼下过，见办公室亮着灯，就上来看看。我简单自我介绍几句就抱怨，人都走光了，还要办公室干嘛？他只是无奈地摇头。他说学校也是乱糟糟的，一些年轻的教师和员工也要求出去串联，恐怕到时食堂都开不了门。他安慰我，要我坚持。只要有红卫兵“总部”在，就能分散一下学校的压力。

国庆节前夕，聂元梓来红卫兵“总部”，这是我第一次跟她近距离接触。她只在办公室站了几分钟，问的都是接待方面的事，要我们到东语系、西语系找些高年级学生，方便接待国外的客人。

几天后，牛辉林和“校文革”的人又来过几次，多是商量国庆北大学生游行和晚会队伍的组织安排，以及节后国庆观礼代表来校参观的接待等。国庆以后，外出串联的学生更多，“总部”工作人员也走了。全校性的活动都由“校文革”组织安排，有时也挂上“北

大红卫兵”的名义作陪衬。但校外发生的围困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打倒陶铸等活动，以及文革初期“破四旧”、“抄家”、“批斗”等，“北大红卫兵”从未介入这类活动。两个月后，“北京大学红卫兵”就销声匿迹了。校文革没有宣布解散，它是自行瓦解。

当时给我的直觉是，大批学生都外出，牛辉林却在坚守，看得出，他是一个肯负责的人，而且当时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助聂元梓和“校文革”一臂之力。从聂元梓的态度看，也颇有风度，给我的印象也不赖。

但好景不长。聂元梓是因一张大字报一举成名，她就像今天一夜爆红的明星一样，立即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焦点。人们把她的出身、家庭、经历和婚姻，正面的、负面的，全都搜罗出，再根据各自的好恶加以评说渲染。那个年代学生心目中革命者、英雄人物的形象总是高大完美、容不得半点瑕疵。一些负面传闻，使聂元梓的“革命左派”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目中打了折扣，甚至产生恶感。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聂元梓要求牛辉林派红卫兵到她家“驱赶外地学生”。聂元梓来到红卫兵“总部”亲自布置牛辉林去办，说这两个“红卫兵”在她家闹事，让牛辉林把他们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教育。而牛辉林事先丝毫不知道，这其实是聂元梓的家事。聂元梓曾是这两个“外地学生”的后妈，孩子的父亲是中央监委常委吴溉之，她离家时拿走了孩子们的东西，人家找上门来讨要。吴溉之的家，就是聂元梓不久前离开の家。

那天下午，聂元梓在“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着我们几人的面，要求牛辉林找到她家中，把外地学生送走。我是这件事的见证人之一。晚上是法律系吴××通知我守电话，说他们夜里有“重要任务”，也就是去送那两个学生。

下半夜，牛辉林回来，脸色难看，进门就破口大骂聂元梓“不是东西，把我们当猴耍”。原来，聂元梓让把这两个孩子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中央领导，说她已经联系好了，但去了根本没人接待。聂赶来，又让送回他们家，先说“让他们的父亲教育”，又说“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要抄家”，并且亲自带到胡同口，指点吴溉之的家，这才知道是她丈夫的家。牛辉林并没有抄家，而是在吴溉之老人的指点下，把放文件的柜子贴上封条，实际是保护

起来。几天后，牛辉林还与同学专程去看望了吴溉之老人。回访中，吴溉之老人讲述了他与聂元梓结婚前后的情况，并嘱咐了一些话。此后，牛辉林和几位同学便决定退出运动，当逍遥派。但并没有反对聂元梓。

有些人就把此事与聂元梓当初出于自身政治需要，与吴溉之结婚，这样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校园里流传。几十年后，聂元梓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在《聂元梓回忆录》里，她专门对“抄家”一事作辩解。其后，牛辉林不得不对此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披露真相。

那一回之后，聂元梓没再来过“北大红卫兵总部”。牛辉林也到外地串联去了。

客观上，“北大红卫兵”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立前后，正处在大串联高潮时期，大批学生外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北大红卫兵”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就是一盘散沙。

“总部”的头头和工作人员，连招呼都不打，就各自外出串联。牛辉林走的较晚，总算来过几次。他之外，我就不知道“总部”还有哪些人组成。后来牛辉林也走了。主观上，是“总部”人员对聂元梓都没有好感，不听指挥。北大干部子弟多，校内老干部多，了解聂元梓底细的人多。我们听到有关她的传闻，几乎全都是负面的。

聂元梓自以为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容不得任何批评意见。拥护聂的逻辑就是“毛主席是支持聂元梓的，反聂就是反毛主席”。一些对聂元梓和“校文革”发表批评意见，议论聂元梓各种传闻的同学，不断遭到批判批斗。中文系女同学沈达力被“系文革”批斗后不堪屈辱，服毒在红湖自杀，更引起群众对校系两级“文革机构”强烈不满和愤慨。部分同学组成“井冈山公社”和“东方红公社”，公开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

聂元梓和“校文革”对“北大红卫兵”和牛辉林等人早已失望，趁着军训，另外组建了“新北大公社”。他们没有宣布解散“北大红卫兵”，而是凭借“校文革”的权力，以系为单位，另行成立“新北大公社”，把“北大红卫兵”大部分成员裹挟进去，对“总部”人员则采取挤压。移走了总部电话，抢占了办公室。我和几个同学势单力薄，无力抗争，

从哲学楼被赶了出来，带出来的只有那枚“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的大印。“北京大学红卫兵”名实俱亡。

我和几位同学不甘心就这么散伙，就在25楼三楼找了个空房间做办公室，我也住在里面。

1967年的二、三月，我在校园碰到牛泰升，喜出望外。他和牛辉林是同班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和牛辉林总在一起。果然，牛辉林很快就找来了。

“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被“新北大公社”占领后，我在留学生宿舍25楼找了个小房间，为了赌气我在房门上贴上“北大红卫兵总部”。我们还用“北大红卫兵总部”名义印了两期《新北大红卫报》。牛辉林没想到，在全校一片萧杀气氛下，他的红卫兵“总部”居然还在。但他不想再干了。趁北大“复课闹革命”，宣布退出“红卫兵总部”，各回各系，参加“复课闹革命”和“军训”。

此时，聂元梓和“校文革”刚把反对他们的“井冈山公社”和“红联军”压下去。正想借“复课闹革命”和“军训”之名，恢复她的一统天下。许多同学不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就三五成群地自行离开学校，到工厂、到外地，去“与工农相结合”；留校的也大多逍遥，或躲起来看书，或四处闲逛。整个学校空气都很沉闷。我住的25楼本来就人少，又地处南校门一隅，更显得冷清。

牛辉林等人的到来，使冷清了几个月的小房间顿时有了生气。几天后，牛泰升和李怀进也搬到我旁边两个房间。大家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各地见闻，小道消息，聊个不停。

短暂的热闹以后，大家很快就陷入一种精神空虚、思想迷茫的状态。整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睡懒觉看闲书，到圆明园、颐和园闲逛，去香山、樱桃沟爬山。

这些同学几乎都是来自工农或中低层干部家庭，自幼在家里、在学校受着严格的传统教育。按当时的标准能考入北大，无论政治上还是学业上，他们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来到北大，又受到北大“科学、民主”和不盲从、敢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浓厚学术气氛的

熏陶。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带有些自命不凡的傲气，遇到挫折、失败，不服气和究根问底。带着这种思维定式，他们本来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看过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编的一本《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言论集》里面收集的“言论”，大部分都是他们凭空捏造的。1968年3月29日“3·29武斗”后，有些同学不愿意介入武斗，离开了学校。“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就利用聂元梓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拿着北京市革委会公检法的介绍信到全国各地，由当地公检法配合抓人，私设公堂，逼供诱供。有的同学被迫交代，甚至胡编乱造。他们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加工成“反革命言论”。

那些议论或牢骚，其实跟牛辉林本人关系不大，几乎都是一些住25楼的同学在宿舍打牌、吃饭、闲聊时的三言两语，或听到什么消息时随口说说想法、看法，没有什么明显攻击、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攻击什么人。当时牛辉林没有住在25楼，跟大家闲扯胡聊的机会并不多。

“二月逆流”事件之后，大家很不理解，很气愤，为老师鸣不平，讲过不少同情老师的话，也仅仅是在宿舍里讲讲。这些议论成了“校文革”整我们“反革命”的主要“罪行”。聂元梓把牛辉林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就是因为他是“红旗飘”的头头。

我还要说，如果现在能再看到那本“言论集”，就会发现，这些经他们加工过的“反革命言论”，历经五十年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几乎都没错、都对了。我们议论的一些大人物几乎都倒台，我们同情的一些人都恢复工作或平反昭雪。

我们没有先见之明，也不比别人高明。我们只是根据自己受过的教育和自身经历，凭感情、直觉和常识，对周围发生的一些事，在观点和看法上与当时的“形势”发生偏差。我们爱党，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当聂元梓的大字报指向党委时，我们群起攻之，我们“错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说聂元梓是“革命左派”，我们支持。后来却发现并非如此。

二、成立“红旗飘”

我们身处北大，“校文革”没法回避，聂元梓没法回避。但是，要我们再俯首贴耳地跟着她走，心不甘、情不愿。不跟她走，干什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这是我们议论最多的问题。

从牛辉林等人进驻25楼，就不断有人来访。他们大多都是一些对聂元梓不满，又被迫编进“新北大公社”的原“北大红卫兵”的“老兵”，希望“北大红卫兵”能东山再起。也有不久前被聂元梓镇压下去的“井冈山”、“红联军”成员，他们过去认为“北大红卫兵”是聂元梓的“御林军”，他们来试探牛辉林等人现如今的态度。学校一些干部和教员、教授也间或来访，他们多为北大目前的局势表示忧虑。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们对学校基本形势和人心所向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我们的良知不允许我们就此颓废。

当时的北大刚刚把“井”“红”镇压下去。聂元梓“校文革”对外到处夺权，对内镇压不同意见的群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校系领导干部和教授被关入“牛棚”，学贯中外的知名学者、教师、学生被迫自杀的事，时有发生。

当年，大家都是二十岁左右，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学生，一旦有了目标，恨不得马上拉起队伍跟聂元梓干一场。但牛辉林认为，很多人是不满意“校文革”和聂元梓，但在具体态度上分歧很大，有的要“坚决打倒”，有的“一批二保”。他们中间，有对“校文革”还抱有幻想的，也有鉴于“井、红”刚被镇压，心有余悸的。牛辉林还认为，聂元梓毕竟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她对垒，风险很大。他要大家多方面考虑，尽可能具体一点、周全一点。

我们没有坐下专门讨论，都是三三两两闲聊、争论，牛辉林也在其中，主题大都集中在北大校内的问题上。现在回忆，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聂元梓的看法。从当时学校传出聂元梓的经历来看，她挑头带着哲学系部分教员攻击陆平和党委，说北大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为纠正他们的错误，1965年北京市委

在国际饭店专门开会帮助他们，邓小平、彭真严厉地批评了她。她很紧张，匆匆和中央监委的吴溉之结婚。不到一年，她嗅到彭真失势，抛出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直指彭真，并揭发安子文、吴溉之等人是“彭真反革命集团”成员，以示划清界限。这完全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和野心家的表演。这样的人虽然可以得势一时，但终究要被人民抛弃。

二是队伍。“北大红卫兵”已经消弭，只能另组建一支队伍。聂元梓和“校文革”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惯于“枪打出头鸟”。为此，新队伍成员要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的人组成。按当时的要求，就是出身要好、本人是党团员。组织个短小精干的小分队。

新建的队伍用什么名称，也犯过难。人数少，但真的叫小分队又显得小而无为，有一天听到外面大喇叭播放毛主席诗词歌曲，有“井冈山上红旗飘”之意，牛泰升、李怀进等受到启发，说就叫“红旗飘”吧。

当时我负责登记人数，很长时间“红旗飘”的在册成员只维持在六七十人左右。以后“团、零、飘、井、红”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时，“红旗飘”的成员也就百十来人。

三是处理好校内外的关系。北大校内当时冷冷清清，校外和外校却很热闹，如揪斗刘少奇，批“二月逆流”，抓“联动”，以及一些院校批陈毅、斗彭德怀，还有些院校两派内战正酣。为此，牛辉林要求“红旗飘”的目标始终对准校内，不要介入社会上和外校的“斗批改”。他说，“社会上的事太复杂了，咱们不了解，不要去掺合”。还说，“不少外校的两派都对聂元梓没有好感。我们也不去理会其他学校的事。”

直到现在，我都十分赞赏牛辉林当年“只打内战”的斗争策略。后来聂元梓和工宣队抓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建立了庞大的专案组，内查外调，结果除了他们编造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没有任何其他口实。他们想要抓“黑手”，加害于人，结果却查不到与外界的任何关联。

“红旗飘”成立时，人太少，没有什么明确的分工。牛辉林算是头儿，他为人诚恳，

有领袖的才能。他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事一起议，定下来就根据各人的特长随机安排，分头去做。王忠林思路敏捷，文字表达能力强，一些重要的声明和批判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吴金岳个头高、嗓门大，又是公安出身，造声势非他莫属；徐运朴、牛泰升理智沉稳，是牛辉林的得力帮手；何本芳忠厚踏实，他和他系里的“老红卫兵”始终跟牛辉林不离不弃……。

“红旗飘”没有开成立大会，只是由王××起草了一份成立公告，由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大饭厅前。公告写明“红旗飘”成立的宗旨，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路线。当时口号还是只提“彻底批判”，没有提“打倒”。两天后，吴××扛着新制成的“红旗飘”大旗，带领一二十个人到大餐厅，参加“校文革”举办的孙蓬一（校文革副主任、聂元梓的副手）和徐运朴（校文革成员、反对聂元梓）的辩论大会，为徐运朴助威。

1967年1月解放军进校在北大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训。军训后北大开始整风，校文革的报纸《新北大》发表了关于整风的社论，社论说“校文革决定开门整风”。

“红旗飘”的突然出现，震惊了全校。许多人认为“红旗飘”背后肯定有什么人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公社”的头头们也始终认为“红旗飘”敢跳出来叫板，一定有强势的背景。他们没有立即组织强力的围攻，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打探摸底。“抓黑手”是文革中惯用的手法。一般是找那些原来在台上、后来被打倒的什么人。为了搞垮哪个组织或个人，就说这些被打倒的人是哪个组织的“黑后台”。实际上，我们“红旗飘”没有跟中央一级的任何人有过接触，也没有受到什么人的指使、授命。更没有参加社会上的任何组织。

“红旗飘”刚问世，就吸引了众多关心学校运动的老师和同学关注，25楼更热闹了。一些老师来了，包括周培源、季羨林、郭罗基、杨克明等，开始是出于好奇，继而都表示支持。更有不少同学来，要求加入“红旗飘”，但大多被婉拒，原因就是“出头鸟”风险太大，我们不希望牵连别人。别人拉队伍可能希望人数众多，而“红旗飘”却不扩大，给外界更增加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也带来一些同学的误解和非议，有人说“‘红

旗飘’不团结大多数”等。对此，“红旗飘”从未做过澄清或解释。

这时北大已出现了一些“反聂”的组织，先是原“井冈山公社”和“东方红公社”（简称“井、红”）东山再起，直接喊出“打倒聂元梓”的口号；紧接着以化学系 0363 级为基础成立的“北京公社”（简称“零派”），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批判聂元梓”，响应者众，以后逐步升级到“打倒聂元梓”；最后是从“新北大公社”分裂出来的“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团派”），开始口号是对聂元梓“一批二保”，最后也是要打倒聂元梓。一些富有正义感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加入，周培源副校长等 134 名干部发表《公开信》称：“3 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五个“反聂”组织出现后，“红旗飘”人数少，虽有战斗力，却不再是主要力量。“团、零、飘、井、红”五个反聂组织，最初口号和目标不尽相同。是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在“反聂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对反对和批评她的群众不加区别地打击、镇压，甚至采用抓捕关押、私设公堂、残酷殴打，使一些本来对她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加速了五大群众组织团结和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兵团设勤务组，推举周培源为组长。

三、解决“扩大化”

聂元梓面临“井冈山”的强大攻势和内外压力，阴招损招一起上。阴招是炮制危言耸听的“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妄图以政治压力迫使“井冈山兵团”屈服；损招是武力征服，他们专门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和“东线”、“西线”指挥部。于“3·29”夜间武力突袭抢占了 31 楼，妄图以武力征服“井冈山兵团”，拉开了北大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井冈山兵团”一成立就遭到“校文革”的围攻，最艰难的时候，是被聂元梓“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围困在几座孤零零的学生宿舍楼里，断粮断水断电，几乎陷入绝境。

为了整垮井冈山，聂元梓“校文革”变本加厉地大整“反革命小集团”。1968年4月，下令成立了“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抓这三个组织的“反革命小集团”，对这些组织的成员进行了抓捕关押、酷刑审讯逼供；重点打击“红旗飘”，对牛辉林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是毛主席派人来解决北大清队“扩大化”，才得以解救。

这段历史，中央早已有明确的结论。1970年3月，毛主席签发了北京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的北大《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等报告，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报告》明确指出：北大校文革对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采取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的方针。校文革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63军宣传队进校后，在清队中，继续了聂元梓“派文革”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井冈山“一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在这个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

1969年3月，毛主席派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进北大纠偏，解决了北大“清队扩大化”问题，对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给予平反。9月，成立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为主任。■

【专稿】

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

——我对北师大“4.26事件”的几点看法

蔡鸣乔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在“批清”运动中与北师大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是如何形成的，从而揭示了“4.26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和“4.26事件”的性质。提出应当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才能避免有失公正。

关键词：批清 反对派 个人意识 群体意识 语境

这个题目，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敢动笔。因为要详细地分析“4.26事件”，势必要涉及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是我无法做好也不愿意做的事。但作为一个“4.26事件”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我又不希望有人对“4.26事件”做出片面的不准确的评论。在大多数当事人选择沉默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说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供研究那一段历史的人参考。

一、1971年北师大“4.26”事件

1971年4月25日半夜时分，300多名军警对北师大发动突袭搜捕，搜捕行动持续到26日凌晨。当夜从中南楼、中北楼及校内其它住宅抓捕男女学生和个别教工100多人。抓捕过程中，发生普遍的殴打、揪头发、拧胳膊、拖拽等暴力行为。

据知情者反映，自25日晚10点左右，师大校园即被控制包围，只许进，不许出。抓捕时，有校宣传队工作人员手持名单对照抓人。但由于事发突然，现场十分混乱，致使一

些旁观者虽不在名单上也被误抓，第二天经甄别后从关押地怀柔放回学校。

26日凌晨，被抓捕的学生、教工，被拖到10几辆各种汽车上由军警押送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境内的一处兵营。以办“学习班”的名义一直关押到11月上旬，才陆续放回学校。在怀柔期间所有人都被限制行动自由，一部分人一直单独关押。少数人回校后继续单独关押，直到1972年毕业分配前后才陆续释放。我本人属于后者，自4月26日直到第二年的3月8日，一直单独关押，共计319天。

这就是在北师大文革史上无法回避的“4.26事件”。

二、“4.26事件”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件？

当年，全面执掌师大大权的宣传队对“4.26事件”的定性有两种说法：一是说，“4.26”之所以抓人，是因为有人破坏“5.1大清查”，为了维护首都安全，师大宣传队配合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的军警采取的治安行动；二是说，“4.26”是为了“批派性、平山头”，把坚持派性不服从宣传队领导的这些人“请”到怀柔去办学习班。这两种说法影响深远，至今关心那一段历史的人恐怕仍或多或少地受这些说法的影响。

宣传队的这两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观点是：“4.26事件”，是师大宣传队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对师大在“批清”运动中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实施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打压行动。

宣传队的第一种说法纯粹是为抓人找借口，对此，大多数人应该没有太多异议。事实是，“4.26”之前几天，确实有一次“5.1大清查”，那一天在中南楼的个别房间里，个别学生确实与进行清查的宣传队员发生过争执，但那只是非常局部的事情。而“4.26”被抓捕者绝大部分在那次“5.1大清查”中是配合了清查的。以一件非常局部的、个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为理由，如临大敌地动用300多军警对100多人实行暴力抓捕，这种借口是不是太苍白、太站不住脚？

所以，很快第二种说法就摆到了台面上。这也是最能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的说法。因为，人们看到的表面现象就是：自1970年到1971年“4.26”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原“造反兵团”的几个头头和部分群众，在当时宣传队领导的“批清”运动中，频频写大字报批评宣传队的作法，甚至冲击宣传队组织的批判大会会场。这些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狂悖无理”的行动，不是“坚持小山头主义的派性”是什么？

要厘清这一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个事实：“4.26”被抓捕的人中，从现在能够落实的不完全的67人名单中，至少有14人从未在组织上参加过“造反兵团”，也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组织的任何活动，我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怎么解释这一事实？¹

问题的实质并非是什么“山头”和“派性”问题！如果真是“平山头”，为什么要把从来就不是“兵团”的人一起抓走？

研究历史事件必须基于史实。事实就是：“4.26”并非是单纯针对“兵团”的抓捕行动！那么，抓捕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从经过甄别后仍然关押在怀柔的人员情况看，这些人虽然并非都是“兵团”成员，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人！

所以说，这是一次针对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的打压行动！要说“派”，那也只能说：“4.26”抓捕的对象，就是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

因为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就可以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实行暴力抓捕吗？为什么就没有人问一问：在师大怎么就会形成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这些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

三、在“批清”运动中与师大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

¹ “4.26”部分被抓人员名单，详见赵惠中：《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待发表）。

反对派是怎样形成的？——外因分析

看待历史事件，要从历史的沿革中找出事物发展的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分析、剖析表象下的本质。

1. 宣传队进校初期的校内形势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自 1968 年秋至 1970 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师大原有的各派学生都基本回到各自班、系，在宣传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就是这样。至少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没有发现明显的派别活动。

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是：“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就宣布‘兵团’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推倒了谭厚兰强加给‘兵团’的罪名，指出林杰等坏人插手北师大，破坏北师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¹

一个还能回忆起的事实是：在“批清”运动初期，宣传队还曾安排原“兵团”头头王颂平到全校批判大会上发言，只是在曾经的“兵团”大将蒲寿章的冲击下发言陷于流产。

上述事实指向一个疑点：是什么原因使一开始接受宣传队领导的原“兵团”部分成员及其他群众后来又走到了宣传队的对立面上了？

2. 1970 年自上而下的“批清”运动

事情发生变化的肇端，是 1970 年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运动。

“5.16”本来是出现在 1967 年春夏之际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 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钢院和一些其它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从此销声匿迹。

吊诡的是，自从 1968 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 1970 年左右从上到下

¹ 吴建学：《井冈山造反兵团》简史（待发表）。

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师大宣传队紧跟上级部署，迅速在校内掀起“批清”高潮。

2. 宣传队执行的“批清”政策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逼上梁山”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批清”运动被整肃的对象有多么广。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上面“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盘棋局中，被牺牲的棋子并不只是某一派群众组织的成员。所谓的“批清”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扩大化、要无中生有——说“无中生有”更能反映运动的真相！

如前所述，“5.16”不过是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矛头指向周恩来，其成员早就被抓被斗，早已土崩瓦解。为什么到1970年又要旧事重提，从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是一场人为的从震源波及全国的地震，是一场要将前期权宜搭建的“违章建筑”统统震塌的地震。至于在这场地震中会死伤多少无辜者，那就不是政治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师大宣传队忠实地执行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清”政策。从一开始，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每一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师大人应当记得，那一时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又空空洞洞，在那些又臭又长的批判稿中，有哪一句触及了极左的根源？在那些神秘秘的专案组中，哪一个不是就事论事地整学生，而不追究揭露蒙蔽、操纵年轻人干了坏事的后台？

相反，对于偶然窥见了一点点帷幕后真相的人，却又穷追狠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例如，那年在怀柔时我被揭露出曾经说过一句：“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宣传队那个叫雷炳的参谋如获至宝的样子，至今让我历历在目！

所以，是宣传队执行的矛头向下、蓄意要扩大化的“批清”政策把一部分群众推到了对立面上，这是师大形成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外因。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下进驻学校的宣传队，其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要说师大的反对派妄想取代宣传队的地位，是谁也不会相信的！那么，这些人站在大权在握的宣传队对立面闹来闹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外在的原因，只能是因为对宣传队领导的运动矛头所向极为不满，这种“闹”是抗争，是一种本能的自卫反应。

四、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形成的内因

有人会说，同样是参加过“兵团”，同样是在运动前期很活跃的人，并没有都走到宣传队的对立面去，并没有都抓到怀柔去呀！所以，“4.26”事件的受害者，其命运轨迹的形成当然还有重要的内因。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们站到反对派队伍中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是，从主流和骨干的层面分析，“兵团”及其他反对派中的部分人对形势的误判应当是这种内因的主要成分。

宣传队在师大领导“批清”运动，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

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从现存的那一时期“兵团”针对宣传队贴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其中反复强调要“彻底揭开王、关、戚、林插手师大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一切暗藏的‘5.16’反革命分子。”声讨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口口声声说宣传队的作法是要“达到死死捂住王、关、戚、林、‘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师大的阶级斗争盖子的目的。”¹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心照不宣的意思就是：谭厚兰的后台还没有都揪出来！这个后台，在不少人的心中就是康生，或许还有谢富治。这既是1966年7月27日那天康生自己不打自招的“黑线论”的心理暗示所致，也是几年来谭厚兰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大家心中形成的猜测和判断。用今天的眼光看，其实也是事实，尽管谭的后台并不仅限于这一两个大人物。

于是，中央宣布要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后，这些人立即兴奋起来，以为这一回不仅要把谭厚兰一伙打翻在地，而且会扯出萝卜带出泥，有更大的黑后台要倒台了。毕竟，从1966年以来，上面倒台的大人物一个接着一个，谁也没说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已经结束了呀！

这种对“批清”运动的目的、走向的错误判断，应当是这一部分人公然站到宣传队对立面上的重要内因之一。

“倒谢”是公开的史实，至于反对和怀疑康生，客观地说，只是少数人私底下的行为，因为毕竟有一个叫《公安六条》的高压线在那里横着。我始终认为，在师大那种环境中，有多少人没想过谭厚兰的后台是谁？只不过有的人想得深一些，有的人想得浅一些；有的

¹ 井冈山造反兵团：《彻底批判师大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油印传单，由新北大公社原动态组组长胡宗式先生提供）。

说出来了，有的只想不说。“批清”运动开始以后，有的人认为事情会有一个了结，值得为此坚持抗争一番；有的人醒悟得较早，选择了务实，不想为此去坚持，不想去做无谓的抗争。这也是为什么到后来站到宣传队对立面，成为反对派的人数不多的原因。

当然，指望通过抗争，最后能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也是这一部分人内心的动机之一。这种缺乏自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一贯正确，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通病，只不过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格外严重、格外执着而已。也是因为这种认知缺陷和性格缺陷，使得自己不能审时度势，调整策略，规避风险，只知一味激化矛盾，引来灭顶之灾！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也许只恨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但宣传队上面的人凭着他们政治家的敏感和手段，是能够感觉到这种来自下面的干扰的，这种在“批清”运动中妄图矛头向上的肘腋之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势必除之而后快！

总之，从“4.26”当晚及之后的种种现象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4.26事件”事先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策划的，有明确的目标和分工；从事件的结局看，也确实达到了组织者的主要目的。至少，从那以后，宣传队可以在北师大畅通无阻地推行那一套极左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了。

四、如何评价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

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抗争行为？

1. 反对派的抗争行为是一种有限度的觉悟

如前分析，反对派与宣传队的抗争，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宣传队的“批清”运动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在“捂盖子”。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法摆到桌面上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揭露揪出谭厚兰的黑后台，这种立场错了吗？

1982年我在师大进修。有一天，在物理楼东侧的林荫道上与时任物理系副主任的张××有一个对话。张副主任对我说：“那时候，康生是中央领导人，你们反对怀疑康生，能对吗？！”面对他的义正严辞，我只有哑口无言、目瞪口呆！

据说，师大物理系学生杨以鸿，因为在1966年冬贴了一张质疑林彪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林彪倒台以后，毕业分配时杨提出来希望给个说法，宣传队也是这套说辞：“林彪那时还是副主席，那时写他的大字报不能平反！”

我们姑且不论林彪、康生是什么人，杨对林彪质疑的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错了吗？认为康生是操纵谭厚兰干坏事的黑手错了吗？如果没错，就应当肯定！

以张副主任和宣传队们为代表的观点，实际上是说：只要权力没有认定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只要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少数人的超前认知永远是错误的！

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之死。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反对“地心说”，捍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在当时，教会和整个世俗社会都认为“日心说”是异端邪说，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是不是就应当说：布鲁诺死的活该呢？

对事物的认识，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地位、学识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永远会有少数人的个人意识超前于群体意识。承认个人意识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个人意识中的正确内容，能不能保护个人意识，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2. 关于反对派诉求的局限性

用今天的眼光看，反对派诉求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求被高度肯定，肯定他们是师大唯一正确的、一直与谭厚兰做斗争的革命左派，这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做派也是他们总是陷于少数的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等于用暴力的手段打压就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他们企盼揪出谭厚兰后面的黑后台——康生，或许还有谢富治，是否还有别的目标？

我不知道。听说个别人还曾经议论过其他的中央高层人物，但我猜测，那恐怕主要是因为长期得不到支持和肯定而发泄的一点不满和怨气。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没有跳出文革思维的窠臼。

但这不等于说反对派的抗争在历史的层面上就没有丝毫积极的意义。

还是拿布鲁诺来说事儿。布鲁诺当年为捍卫“日心说”被教廷烧死，那时候相对于“地心说”，“日心说”是科学的进步，是对宇宙认识的飞跃。但用今天的眼光看，“日心说”的局限性又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它不过是广袤宇宙中一颗小小的恒星！我们能因此就说，布鲁诺死的毫无价值吗？

再举一个例子，发生在1976年4月5日的“4.5天安门事件”，这是一次来自民众对文革和“四人帮”抗争的事件，是很多文革研究者公认的宣告文革失败的群众运动，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所向。同时又是一次某些人成功地将个人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的事件。在一些人看来，“4.5事件”中的民众行为也有局限性，但你能否定“4.5事件”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吗？

3. 关于“反对派”在文革语境下的斗争话语

毋庸置疑，在师大文革舞台上活跃的哪一派都宣称唯有自己是革命的左派，“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都真心标榜相同的革命理想与拥护对象。”“在一元的革命斗争话语之下形成了竞争关系。”¹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当年的文字材料，无论是1967年底“大海编辑部”发表的《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还是“兵团”的大字报，包括1970年1月18日“兵团”所写的《彻底批判师大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一不充斥着文革语言，无一不标榜自己坚定的“左派”立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们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下意识的斗争策略。哪一种成分更

¹ 李潇：《回忆十年文化史论课》(<https://mp.weixin.qq.com/s/>)

多一些？客观地说还是前一种更多一些，在那种群体意识已经被引发到几近癫狂的状态下，有几个人能跳出文革语境的窠臼？有几个人敢背离文革语境去标新立异？

至于说师大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显然是扣错了帽子，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的宣传队是绝对忠实地执行了极左路线。但是，这里所谓的“左”或“右”不也是源自文革语境的概念吗？虽然也提出过什么“批判极‘左’思潮”，但请注意：这里的“左”字是带引号的！这个引号可不是我这里乱加的，当时所有官方的报刊杂志文件中都有这个引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极‘左’”，其实并不是“左”，而是“形‘左’实右”，也就是说，绕来绕去，最后还是要批右！这也是为什么在所谓的“批清”运动中那些又臭又长的批判稿总是言不及义、不知所云的缘故了！

其实，在中国的政治辞典中，一直都是“左”就是好，就是革命，就是先进；“右”就是坏，就是反动，就是落后。所以，在文革的争斗中，哪一派都是动不动就给对方扣上“右派”、“右倾”的帽子，还真没见过为了打倒对方，给对方扣上一个“左派”、“左倾”帽子的。说到这里，那时候“兵团”的笔杆子在和宣传队的争斗中，居然胡乱地给对方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字材料，应当试着过滤掉那些特定语境下的套话、空话、废话，从中找出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总之，从历史的层面评判历史事件，方能公正，避免机械偏颇。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方能从中吸取教训，使自己变得成熟！■

2018.4.10

【评论】

胡适“史家想象力”浅释

——兼评胡鹏池“蒯大富二见吴德”的推断¹

周家琮

研究清华 727 事件，考订蒯氏当日行踪，鹏池兄断言蒯两次曾面见吴德，且十分执着、无比自信，令常人费解。此事在 727 事件乃至清华文革研究中，本不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所涉的有关史学见解，却颇有探讨的价值。感谢鹏池兄引发此话题，敝人得以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也可以借此梳理和深化对有关史学问题的思考。

鹏池兄坚持蒯氏 727 曾二见吴德的推断，除了以大胆想象见长的固有的文学情怀，以及《清华园的一只蝴蝶》推理成功的鼓舞外，胡适先生关于“史家想象力”或许是他持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民国十年八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又与颀刚略谈编《中国历史》的事。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欠解释的能力。”

仅根据以上这段文字，确实容易认为，胡适先生主张史料之缺失，可以通过艺术想象力来补充替代。但我们探究学者的学术见解，不可仅根据一段文字轻率结论，既要解读其

¹ 此文原标题是《胡适先生的“史家想象力”和鹏池兄的误读》，现标题为编者所改。胡鹏池微信转发时按：我由衷地感谢并欢迎此文，初读唇齿留香，再读已觉受益非浅，相信由此将引发在下对清华文革及有关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思考，估计对诸多校友也多有裨益。是故广为转发，传播。2018年2月12日（腊月27）

言论的字面意义，又要分析其说话的语境和背景，更要考察该学者一贯的看法，方可得到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

胡适先生这段话，存之于私人日记，本不准备发表和用于学术交流。日记文字，倘涉私密，其可信度和价值当胜于公开内容，但其中的学术见解，多不及公开发表的文字严谨和周延。语焉不详、信笔驰骋、纠结舛错，皆间或有之，下笔之谨慎，甚至不及今日之微信。我们不妨对照胡适先生五年后就同一话题，发表在《古史辨》第二册《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中的见解：“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接下来的这段话，对“艺术的”和“想象力”的史学功能，就给出了比日记明确清晰得多的定位：“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和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也就是说，所谓“艺术的”和“想象力”，只是用于历史的叙述和解释，并不能直接用来补充缺失的史料，自然也不能作为鹏池兄推演的理论后盾。

关于史料和证据的重要地位，胡适先生在致历史学家罗尔纲的信中，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更能代表先生的史学观。即历史研究须百分之百地立足于证据，证据之外的见识和立论，虽有其价值然不足为凭。并非如鹏池兄的理解：有一分证据，再补充一分推理或想象力，就可以说好几分话。在胡适先生另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中，也可以窥见日记中“大胆的想象力”的功能定位。“想象力”固然须大胆，但亦仅限于“假设”。大胆的想象力属于历史的艺术方面，不属于历史的科学方面，鹏池兄却以为凭“想象力”得到的，就可以当做可靠的史料和确凿的证据，其过高的期许与先生将其定位于艺术，显然远不在同一层次。鹏池兄进而轻率地批评先生“艺术”用词不当，实在是误读了白话文运动的宗师，未免有失恭敬。

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文、史、哲不分家往往界限模糊，适之先生所述历史研究及其衍生品的两方面，也常常见之于对史学和文学艺术关系的讨论，历来见解纷陈。梁任公推

崇“史学最重科学精神”，文学“都是超科学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文学家最重的是想象，神经太健康的人，必不易当文学家”。钱锺书先生却对文学高看一眼，“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政治挂帅的郭沫若则以唯物史观批判胡适的整理国故，认为胡只要“实事求是”、只能“知其然”，而他则要“知其所以然”。郭虽然对胡有所曲解，却也透视出在郭的心目中，胡重视史料，实事求是有余，大胆想象不足。上世纪中叶文化界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讨论，可视为诸先生高见之余绪，也是对胡适先生“做历史有两方面”的解读。

总之，他们对想象力和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看法虽各有千秋，但在史学是实证科学，实证的基础是史料这一基本观点上，并无根本的不同。而且从来不认为想象力和文学，可以逾越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边界，填补实证史料的空白。倒是晚近的后现代史学，其解构历史事实，否定历史真相存在的根据，除了认为历史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左右，以及历史文本化颠覆了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传统关系，语言是抵达历史事实的障碍外，更因为历史是叙述，要编情节用修辞，难免虚构从而导致主观性，实际近乎文学。与鹏池兄的见解倒有所暗合。

对历史研究的艺术方面，我们不妨就推理蒯某是否二见吴德的“所以然”，作一次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代入感”尝试。如果“我”是吴德，毛既然下令保密，连江青都三缄其口，“我”敢提前打招呼泄密吗？这么重要的行动，不搬出谢富治，“我”自己会单独见蒯吗？如果是“我”约见蒯，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如何能很快找到在校外的蒯某？如果是蒯求见“我”，如何对蒯打招呼？难道“我”敢于临时擅断？再者假如“我”是蒯大富，无论是吴召见还是“我”求见，“我”会如此安排随员和行程吗？“我”会那么凑巧就在727上午约见吴吗？倘以笔者的小人之心，代入一回727上午的蒯司令，“我”多半可能：在北京站接到了总部的老战友，介绍武斗近况，分析当前形势，议议下一步的打算，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离开了有子弹飞的校园，来到熙熙攘攘的城里，满满的自由感幸福感油然

而生（笔者有亲身体会），找个地方和弟兄们搓一顿，也是很自然的选择；仲夏时节用不着借机下澡堂，革命年代娱乐场所也有限，但到公园走走继续谈革命甚至看场电影，也并非不可能；中途顺道去其它大学或单位，看看大字报或找其他领袖交流问计，更是理所当然；泡妞、内急等说法，固然是调侃，但在城里干了其它不足与外人道的革命工作，对不起，“我”只有按下不表了。其实北京城很大，清华离火车站够远，三小时并不长，也容纳不下太多的想象空间，“我”也许压根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走走停停、说说看看，也就到了清华园。

当然鹏池兄断言蒯某 727 上午曾面见吴德，并非完全靠大胆想象力和逻辑推理，原始来源是吴德回忆录的白纸黑字。但是以我等的阅读和亲身经验，老年吴德记忆文革有误绝非小概率事件。比较近的例子，是罗征启老师亲历的 4·23 出逃，对有关情节和人物也多有误记，所以史学界历来主张孤证不立。民初的历史和考古之所以成果丰硕，窃以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厥功至伟。鹏池兄不认为吴德回忆系孤证，说 728 接见时谢富治“打了招呼”的申明可为佐证。然谢氏并未讲明招呼的时间，似不足为凭。倒是陈育延等多名亲历者对蒯上午面见吴德皆矢口否认，彼等虽有一定利害关系，但时隔多年利害早已淡化，多人众口一词的反证不可再视为弱证据。遗憾的是，蒯本人以及随行者和知情者，虽一致否认上午面见吴德，但对最有力的证据，即离开北京站到返回清华这一段的时间表，皆未能具体还原，以致公案难断。

貌似汗牛充栋的史料，其实每逢引用，却永远有限短缺。以有限的史料，回答史家对历史真相的无穷追索，既是史学自身内在的悖论，也恰恰是史学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 727 上午那一段原始史料和证据的缺失，才逼得受吴德回忆启发的鹏池兄，以大胆想象力来填补。“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胡适先生这句话，与其说是他的主张，不如说是对史学研究的无奈描述，先生或许对此系持中性立场，并不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如何填补。笔者则以为有益的想象力填补，须谨守以下三项原则：

一、填补的材料可启迪思路，聊备一说，存之待考，但不可与原始史料等量齐观，并非铁证。“蒯二见吴德”之类最原始的事件，不可作为填补对象。如近年应用大数据研究历史颇有收获，史家通过玉米传入中国的路径时间，以及沿途人口的数据变迁，推断出玉米引入和人口增长的因果关系。但如果某段人口数据存在空白，就不是推理填补所能胜任。

二、切实遵循孔老夫子的教导：“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蒐集材料不先入为主，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轻信一家之言，对缺乏史料的事情可以发言但要慎言，控制言的范围，斟酌言的份量，不轻易下结论。

三、因为填补的不是原始史料，难免受主观影响，更要冷静客观，这又是亲历者和当事人叙述史事之短。胡适先生对陈衡哲女士西洋史研究的称道，就包括远离西洋的陈女士，能够“平心静气”地“用公平的眼光，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叙述西洋的史实”。而鹏池兄对蒯氏的义愤和定见，加上对“逻辑性历史文学”特色著述模式的自信和痴迷，于冷静和客观方面，恐怕难免有所欠缺。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胡适先生的日记，进而观察在所涉史学观领域，先生和史学界同仁的关系和互动，或许会有更全面的视野和更系统的认识。首先是上述日记中对话者顾颉刚先生，众所周知顾先生系《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古史辨》以批判的精神，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传世文本，开展了大量革命性的辨伪论证，堪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历史文本中，或出于政治需要、或相信神话传说、或因为以讹传讹、或产自大胆想象，假冒伪劣的叙述，充斥其间，而且“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古史辨》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无情辨伪和揭穿。剑锋所指，多涉千百年来对史事的推理想象、夸张杜撰。该学派的学术渊源，除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外，还上承乾嘉学派之余绪。后者治学重视训诂考订，极少宋明理学的抽象议论，重证据而少发挥，故有“朴学”之称。《古史辨》在“信而好古”的传统史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也遭到“爱国人士”的围剿，引发了一场史学大论战。

胡适先生对揭露伪造、重视证据的《古史辨》学派，予以高度评价。他在推荐《古史

辨》第一册时写道：“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顾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先生称崔述和顾颉刚分别发起了史学一、二次革命，先生还买来崔的《东壁遗书》送给顾颉刚看。）足见两位先生在重证据去虚妄的史学观上，彼此高度认同。而且无论在胡适先生的日记中，还是在他俩此后的公开文字中，我们并未见到先生和顾颉刚有关这方面的歧见和争论，亦足为旁证。

另一位就是鹏池兄提到的胡、傅之争的傅斯年先生。以敝人有限的阅读范围，并未留下胡、傅曾经争论的印象。不过赵元任先生“言有易，言无难”的训诫，敝人时刻牢记在心，不敢轻言此系子虚乌有，尚祈鹏池兄赐教。倒是顾颉刚自述的一件轶事，可以从中窥见他们的学术关系。胡适先生海外归来，27岁履新北大哲学门学长，应用科学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颠覆了此前老学究的庞杂荒诞，别开生面的疑古立场引发怀疑和不满。彼时傅斯年在北大已俨然学生领袖，有好事者怂恿其带头造反，钦佩胡适先生的顾颉刚和傅斯年系不同专业的室友，傅按顾的建议，听了胡先生的几堂课后，深表钦佩膺服有加，从此以长其五岁的胡氏门下弟子自居。而适之先生亦以从未有过的高度赞赏傅斯年：“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卅年如一日。”胡适先生和他的两个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其史学观虽于细节处或不无歧见，但重证据、去妄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立场，却始终高度一致。

呜呼，哲人其萎，吾侪欲再睹其风范，聆其教诲，释疑解惑，其可得乎！■

2018-2-12

【评论】

读报识史

——评新北大公社“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的《严正声明》

樊能廷

王复兴在《抢救记忆》一书中，先指责牛辉林 1967 年 8 月 9 日讲话“反军内一小撮”。¹又转引聂元梓的话说，“聂元梓文革后提起此事说，‘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研究历史，言必有据。而王复兴《抢救记忆》引用聂元梓的话，无凭无据；他指责牛辉林“反军内一小撮”，同样无凭无据。

研究历史，说话要有理有据，言必有出处，这是常识。王复兴《抢救记忆》引用聂元梓的话，二人私语，无凭无据；指责牛辉林个人 1967 年 8 月 9 日讲话“反军内一小撮”，仍是无凭无据。

近日读报，读北大“文革”校刊《新北大》，看到一篇“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关于目前新疆形势的严正声明》”，以下略称《严正声明》。笔者把这张报纸有关版面扫描成图片，贴在本文中，另外把图片录写为文字，作为本文附件，有凭有据，以示出处严谨和便于阅读。

《严正声明》说“我新北大公社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明摆意味着此前还有“首次声明”或“初次声明”了。笔者受“再次发表”言辞引导，上穷碧落下黄泉，把能找到的校刊《新北大》翻了一个遍，并没有找到“首次声明”、“初次声明”。如果“首次声明”、“初次声明”并没有发表在现在找不到的地方，那么，“再次发表”的言说大概是虚卖人情，给新疆造反派的一个空心汤团。但愿万幸能够看到相关的“首次声明”、“初次声明”，现身于北大“文革”历史文献之中。

¹ 此句出自《抢救记忆》180～182 页。笔者在《王复兴〈抢救记忆〉指误》一文中对王复兴的这一说法有所论及。详见张从主编《燕园沉思录·下》第 495 页，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年。

《严正声明》大声疾呼“我们呼吁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擦亮眼睛，识破王恩茂之流这一卑鄙阴谋，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王、张、丁、裴之流的反，大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在国内一度喧嚣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氛围下，北大肯定有人加入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一风潮。《北斗星增刊》第163期（1967年9月19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同志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于人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说：“最近又是武汉‘7·20’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评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人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插话：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北大也派不少”，谁派的呢？当然是掌权者派的，掌权者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嘛。当时的掌权者是谁呢？是聂元梓“校文革”这个“红色政权”。

派到新疆跟“红二司”、“联工总司”、“兵农造”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就是发表《严正声明》的“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要干什么呢？他们的《严正声明》说得很清楚——“我们呼吁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大造王、张、丁、裴之流的反，大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打倒王恩茂！打倒张希钦！丁盛、裴周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显然，“大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是反军，“我们呼吁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煽动军队反叛、是乱军！

面对如此真凭实据，无须再做任何解说、评论，“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以自己组织名义发表声明，这个组织整体公开反军、煽动乱军，昭然于天下！

《〈新北大〉三打朱老总》刊载于2017年8月30日网刊《昨天》第97期《樊能廷北大文革专辑》，更是揭示了聂元梓亲自操盘，炮制四篇攻击朱德总司令的大块文章（散发全国50万份），让聂元梓自吹的“拥军”谎言破灭，使聂元梓无所遁其形。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新北大》还有诸多攻击老师、大将的大块文章，笔者待有暇时，将一一付之“读报识史”。■

附件

关于目前新疆形势的严正声明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



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决战的关键时刻，新疆的陈再道——王恩茂又一次跳了出来，对新疆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惨无人道的反革命大屠杀，妄图将新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其用心何其毒也！

鉴于新疆目前出现的严重局势，我新北大公社再次发表严正声明如下：

一、王恩茂是新疆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他一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

思想。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和屠杀革命造反派，王恩茂罪行累累，必须坚决打倒！

二、新疆“红一、三司”、“红促会”、“八野”、“联总”是王恩茂一手扶植起来的御用保皇军，是不折不扣的保守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血腥镇压新疆造反派打手的可耻角色。对这些组织中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坏头头必须严加惩办，我们希望这些组织中受蒙蔽的广大群众起来造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热忱欢迎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三、新疆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王恩茂，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竟然恶毒地把人民解放军推上第一线，和革命造反派闹对立，挑拨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的鱼水关系。我们呼吁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擦亮眼睛，识破王恩茂之流这一卑鄙阴谋，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王、张、丁、裴之流的反，大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

四、我们再次重申：以新疆“红二司”、“联工总司”、“兵农造”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新北大公社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打倒刘邓陶！

打倒王恩茂！打倒张希钦！

丁盛、裴周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罗文胡注】

清华文革亲历记（三）

矛盾升级“414”高调登场^[注 01]

罗征启

夺权以后，蒯大富日益嚣张，不可一世，渐渐失去人心。清华的党员干部队伍里，大多数并不了解蒯大富，因为他受压当反革命时，这些干部其实都在劳改，并没有参加运动。蒯大富翻身夺权以后，多数人还是支持他的，但他横冲直撞，到处以暴力或接近暴力的行动夺权时，许多人有所怀疑了。更主要的是以下两件事：

第一，12·25行动。蒯大富们在全国第一个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第一个喊出口号——“打倒刘少奇”。还有，有些大字报造势说要支持蒯大富进党中央！这使得“修养”和“组织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们瞪目结舌，感到晕头转向了。据我所知，党员干部队伍中，曾经有不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蒯大富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中央文革又是代表毛主席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所以，蒯大富的话，我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样的论调在“12·25”行动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

第二，“党员重新登记”。大约在1967年初，那时，我们“黑帮劳改队”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劳动是在基建处修整上下水管道零件，或在仓库翻倒水泥。忽然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井冈山兵团总部通令所有共产党员要到兵团总部重新登记，有的系的党组织被解散。党员干部们议论纷纷，有人私下里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不登记，他蒯大富连党员都不是，要我去他那里登记？”“那么，如果中央下令到蒯大富那里登记，你去不去？”“不去，中央下这个命令，说明这个党完了，这个党员我不当也罢！”据我所知，当时持我这种态度的大有人在，但我们都不敢公开明确地表态。^[注 02]

结果，据说中央很快表了态，这事就平息下去了，但是蒯大富的威信大大下降。

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名字：沈如槐，他是力学系低年级学生，是共产党

员。他在蒋南翔经营十多年的清华党委垮台后，又在强势的造反派头头、受到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支持的蒯大富高压之下，团结越来越多的清华师生，另立门户。而且非常策略地没有完全脱离井冈山兵团。[注 03]只是 1967 年 4 月 14 日开始由千钧棒、战地黄花等战斗组成立一个“414 串联会”，[注 04]接着又成立了一个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顶着巨大的压力，保存实力，一直坚持到蒯大富垮台。我虽不是原清华党委的校级高层领导，但还算比较了解学校上层的内情，比较熟悉原党委领导干部的。我敢说原清华党委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有能力与沈如槐较量一下的。不但和沈如槐，就是他的一些战友，如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宿长忠、周泉纓、张雪梅等人，也都具备领袖的才能。[注 05]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人在清华坚持发出不同的声音，清华的文革历史又将写成什么样子？毛泽东又会怎样来结束由他发动的、蒯大富领衔主演的闹剧呢？[注 06]

而蒯大富及其战友和部下，也并不简单。至少他们是敢想敢干，敢于承担，比起他们的前任，靠“英雄”的老子在背后支撑的老红卫兵和“临筹”（临时筹委会）们有骨气。他们坚持到底，不会一有问题就作鸟兽散。他们管理这部漏了气的“不漏气的发动机”两年之久，也不容易呢！[注 07]

不记得什么时候，“黑帮劳改队”取消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蒯大富的“德政”之一呢！我们这些劳改犯也可以出来看看大字报，组织个小组之类——我们不敢自称“战斗组”，只敢叫“学习组”。我们看到许多大字报的署名很有意思。许多是以毛泽东诗词起名的如，千钧棒、追穷寇、战地黄花等等。有的教师和干部就署名“粪土”（当年万户侯），或“嗡嗡叫”小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甚至有人干脆叫“几个苍蝇”。

我们的学习小组，没有名字，也没有组长。只是大家公推文学宓为召集人。我们取得了几点共识：（1）不公开表态支持哪一派，或公开批评和反对蒯大富。（2）不介入两派的矛盾斗争。（3）对 414 总部多次邀请我们参加 414 的活动，我们还是慎重谢绝为好，因为我们几个人除文学宓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之外，其余的都不好，不要引起误会。只由文学宓负责与 414 总部联系。而且我们知道，414 总部也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两大派系。

东方红战团比较激进，三七战团比较温和。而文学宓和两个战团的关系都比较好，所以由他来联系 414 总部是较为合适的。但他较倾向于三七战团，我和饶慰慈则较倾向东方红战团。其他人还不是很明朗，但在重大问题上，两个战团还是很一致的。

414 总部正式成立的前几天，我们学习小组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活动。即使是 4 月 15 日抢占广播台，局势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我们也坚持没有表态。但是 414 的力量明显在逐渐增强。团、四双方，天天几乎在开会，互相攻击。大字报也非常热闹，双方都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大字报。[注 08]

4 月 23 日傍晚，我们小组正在工字厅统战部的小办公室里一起学习。我们从外面广播喇叭得知，414 正在大礼堂开会。很热闹，但不知道开什么会？

大约八点钟，一个高大威猛的学生敲门进来。文学宓一见他就笑着说：“昨天开会跳上台抢老蒯麦克风的是你吧？”

他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414 在大礼堂里开大会。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总部让我们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因为只有你们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都没有做声，沉默着看着他。文学宓后来告诉我，这位同学姓张（名字我忘了）。

张同学接着说：“414 成立以后，得到许多干部和教师的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主要还是基层干部的支持，如热能系的“两万五千里”等。所以现在基层干部受到压力很大，使得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敢表态。414 成立以后，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签名支持，[注 09]你们也有签了名的，但是淹没在基层干部中间，不是很突出。而公开信领头签名的谭浩强是团委的，靠近学生。作为学生，我们希望党委的中层干部，有人站出来亮相，这样基层干部就解放了。”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听得外面的广播喇叭在吵，我们几个都在思考。

这时，李康说：“这叫火力转移，把蒯大富的火力引过来，‘引火烧身’，解放广大基层干部，解除他们的压力。”

张同学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文学宓说：“这给我们的‘三原则’不同了。”

张同学问：“什么三原则？”

文学宓简单解释了一下。

张同学说：“这只是自保，是保小我。没有大我，何来小我？”[注10]

我明白这是很难抉择的。但是我还是说了一句：“虽然如此，我们的‘三原则’还是要注意的，何必刺激老团，我们还是不点名，保持中间偏四的立场比较稳妥。”

张同学立即说：“好，好，好，你们只要上台发言，讲什么，怎么讲你们自己定。你们赶快写个发言，我到总部去一下，马上回来。”他说完转身就走了。

文学宓说：“老罗你笔头快，刚才你的意思我很赞成，说明你已经打好腹稿了。”

我没有推辞，立即到隔壁统战部的大房间里，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写了个大约十分钟的发言。我回到小房间时，张已经回来了。

我念了发言稿（大致内容）：一、革命小将应该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攻击，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干部和教师一定要支持团结，不要分裂。二、清华十七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干部队伍也基本上是好的。即使现在有些分歧，但在主要方面，在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来的。三、干部和教师一定要和同学们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十七年中校党委和我们自己的错误，在批判中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要没完没了地、不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那样就是继续犯错误。最后照例是高呼口号。我们多次讨论过，认为已经很少人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个口号了，这次我特别加上。

我念了一遍，大家一致说行。

张同学说：“马上走，大家在等着。”

我说：“学宓，还是你去发言吧。”

文说：“唉！你写的，你念正好。我说话平淡，你去吧。”

我看了看饶慰慈，她比我们大，我一直像对大姐一样尊敬她和重视她的意见。她说：

“还是你去吧，我们共进退。”

我被张同学半推半拉的带到礼堂，向舞台西的侧门进去。还没有看见下面的观众，就已经感受到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再往前多走两步，从台侧望去，人山人海，舞台两边也都坐满了人。前面一个发言刚完，掌声热烈，夹带欢呼声。我到清华近二十年，还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在那一段时间内，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有个悬念：群众是真的拥护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吗？看到此时此刻大礼堂里的气氛，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注 11]

这时，我走上舞台，没注意主持人对观众说了句什么，我只听到他提到我的名字，顿时会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不知所措，有点慌了神，左顾右盼，还回头看了看后面。只见后面站着和坐着许多人，我找不到熟悉的面孔。我曾在这个舞台上发过言，做过报告，也做过检讨，还多次参加过管弦乐队的节目表演，可是从来没有紧张到现时这种程度。

掌声停止了，我开始发言：“我代表原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原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原科学处处长徐一新，原教务处副处长李康和我本人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发言。”每说一个名字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接下去我读了发言稿，尽量读得有感情。当中多次被掌声打断。

掌声和大家的欢呼声，使我有时间遐想：张同学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中层干部的出现，正是大家所期盼的。基层干部感到解放了，可以大胆的参加运动了，而我自己也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我们也可以上台发言了。从66年6月开始，快一年了，才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借用京剧的术语叫“亮相”，但是既然“亮相”了，就再也不能退下去了。

我特别注意到，当我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

掌声还没有停。我环顾四周，不知道我发完言以后，上哪里站或坐。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于是还是从西侧门走去。这时迎面上来两个女同学，一把抓走了我的发言稿，说：“我们给你抄成大字报去！”

我回到工字厅那小屋里，他们正在等我。见到我都很高兴，都说很好，很成功。

饶慰慈眼里挂着泪花说：“你注意了吗？你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响应很热烈呢！”

我说：“是。我想是因为彻底砸烂的噪音太多了吧！”

她又说：“如果你报完姓名再加上一句‘我们都是执行了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感谢同学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发言。’那就更好了。我们大家都同意。”

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已经结束，刘承娴惨死，文、饶遭酷刑致残。我们不敢和饶慰慈再谈论此事，因她一提到这段往事就全身颤抖不已。

我曾对文学宓说：“如果没有4·23的发言，我们不至于这样惨吧。我一直感到内疚，你呢？”

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不要后悔，当初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定，不要个人来承担，而且，我们是做了好事的。”

第二天，我看见我的发言已被抄成大字报，贴在第二教学楼的东墙上。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支持和鼓励的意见和签名。也有批判和骂的，如：“你不要命了吧！我们真想揍你一顿，你等着吧，早晚……”还有一条批语写道：“你这个机会主义分子，你想这样就能躲过广大群众的批判了吗？”署了名的，但我早忘记了。

到了晚上，团派批判大字报开始了！火力非常猛烈。有五、六个414的同学一直陪着我们，叫我们不要去看大字报，因为怕团派说不定会搞个现场批斗会，局面不好控制。对我和我们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开始还有点紧张，逐渐就麻木了。

基层干部的压力真的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和政治辅导员，包括我们自己，虽然不能说很彻底，但确实感到呼吸到了自由、解放的新鲜空气。

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我们虽然，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甚至家破人亡。凄惨难以言状。但是，时过境迁，如今回首往事，我们还得承认：无论当时的“团”还是“四”，教师还是学生，党员干部还是广大群众，我们都是真诚地投入而受到一次民主思想的洗礼。

■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三）评注

胡鹏池

[注 01] 这个标题有语病。

[注 02] “党员登记”的做法并不是“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们的首创，首创者是“北航红旗”与韩爱晶。1967年1月9日，北航红旗战斗队发表“夺权声明”：“北京航空学院各级党团组织必须由我红旗战斗队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审查或重新登记”。于是，非党员的韩爱晶领导实施了北航的党员登记。

北航的做法传到清华，有的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论清华党权必须归井冈山》。

1月31日，井冈山兵团冶金系教职工分团率先夺取冶金系的党、政、财大权，宣布“立即解散冶金系党总支和所属的教职工党支部，所有教职工党员三日之内向井冈山兵团冶金系分团登记。”

2月7日，井冈山兵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泉贴出《党员登记倡议书》和《党员登记条例》，并在广播台反复广播。宣称清华党员参加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党，要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引起了很大震动。

当晚在全校整风大会上，沈如槐跳上讲台，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坚决抵制党员重新登记。许多战斗组和广大党员也在会上发言，强烈反对进行党员重新登记。

2月11日，有人在大礼堂前面贴出中央的指示：党员问题一般在运动后期由党组织处理，群众组织无权处理。这样，清华的“党员登记”也就不了了之。

[注 03] 沈如槐书 P155 页谈到“井冈山 414 总部”起名时的过程：

“记得那是在新水利馆开的会。东方红战团的人坚持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以表示与井冈山彻底决裂，他们主张干脆就叫“东方红红卫兵”。三七战团的人希望保留井冈山的牌子，因为井冈山的旗帜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而我们才是井冈山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无论是

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又都认为414的旗帜也不能丢，那是几千名414群众艰苦奋斗的象征。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觉得从井冈山拉出去一支队伍，对老蒯影响可能不大，而在井冈山内部“另立中央”，会使老蒯十分难堪。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最后我拍板决定采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名字。虽然这个名字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带来的好处却妙不可言。”

沈如槐还说到：“需要提到的是我和尹尊声曾就分裂后中央文革会不会“打棍子”的问题征询过张广友的意见。他说：‘中央对于群众组织是很慎重的，一般不会轻易加以否定。’他对我们选用的新名字不以为然，说：‘我看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481-483详述了起名字时发生的争论。他说：“三七战团的人要我坚持在名称中必须有‘井冈山’，并把这看作‘三七战团’跟着‘东方红战团一起独立的条件’”，“这是我坚持的结果，也是‘东方红战团’为了大局照顾‘三七战团’情绪作出的让步。”

结果一样，但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沈如槐为了使蒯大富更难堪，孙怒涛则出于对“井冈山”割舍不断的感情。

[注04] 全称是《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连会》。因为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故简称为“414串连会”。“414串联会”一开始就有相对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政治纲领是：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干部，实行革命“三结合”；理论纲领是：反对形“左”实右思潮。简要说来，“414串联会”所举的两面旗帜是：解放干部和批判形“左”实右思潮。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所谓的“形‘左’实右”就是“极左”；也没有将“思潮”之争上升为“路线”之争。

串联会发起单位共23个战斗组：千钧棒（力03班，沈如槐）、战地黄花（陈楚三）、从来急（刘万璋）、翻腾、第一湘江（孙怒涛）、轮机兵（汲鹏）、不怕鬼（黄瑞和）、八八探照灯（张雪梅）、人民万岁（李良寿）、第一红五星、1356、争朝夕、鹰击长空、暴风骤雨（力05班，郭仁宽、周忠荣等）、曙光初照（王莲芝等）、八八春雷、开新宇、

第一靠舵手、第一换新天、第一高举红旗、二万五千里（倪振伟）、云水怒（周泉缨、杨继绳）、刺刀见红（任彦申、尹尊声）。

（又注：括号内所加是我所了解的战斗组组长或负责人的姓名。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是一份备忘。文革中的所谓“战斗组”很多并没有明确的组长，甚至也没有什么负责人。“云水怒”组长是杨继绳，当时出名的人是周泉缨，杨称周是“云水怒”的发言人。）

“414 串联会”成立大会的时间：4月14日下午3时；地点：西主楼3区208室。与会人员700多，代表250多个战斗组。会议通过了《414 串联会 001 号公告》、《414 串联会第一次大会决议》等文件。

[注 05] 我认为将 414 的这七名头头罗列并进行这样的评价是不恰当的，将 414 头头与清华党委的领导层进行比较更不恰当。

[注 06] 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并亲自领导的，领衔主演的是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所以可以将江青称之为“伟大旗手”。后来江青在法庭审判中为了推卸责任既不敢承认“领衔主演”，也不敢承认“伟大旗手”，自称自己不过是伟大领袖的一条狗，连江青都不敢承认领衔主演，怎么能说文化大革命是蒯大富“领衔主演”呢？连江青也只是“一条狗”，蒯大富只不过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马前卒，蒯的地位只能相当于“狗的狗”。江青自称自己是“一条狗”，其目的是要提醒法庭“打狗得看主人面”。法庭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没有判其死刑。俗话虽然说“打狗得看主人面”，但是俗话没有说“打狗还得看狗的狗的面”，所以法庭判了蒯大富十七年。这里的话有点糙，但是话糙理不糙！

[注 07] 我认为对罗文对团派头头的这种评价也是不恰当的。

[注 08] 只能说有一定水平，比较有影响而已。

在这批大字报中包括有“三七战团”实际负责人高季章策划并组织，我参与的两篇关于《新阶段论》的大字报。《良知的拷问》565 页的注释中记载了这件事：

由高季章、胡鹏池等主笔以“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锔未残”、

“巴黎公社”、“第一红五星”、“第一野火烧不尽”等名义发表的《论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及《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系统阐述了 414 对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对清华干部的基本估计、怎样对待革命的三结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的看法等等观点及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当前（指 1967 年四、五月份）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所以小将要正确对待自己，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否则会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阻力，甚至会沦为革命对象。

我对这段经历至今有清晰的记忆。

邱心伟、原蜀育《大事日志》1967 年 5 月 5 日记载：“团派说这篇文章为 414 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提出‘新阶段论’、‘两小撮论’”。

5 月 8 日记载：“老蒯传达谢副总理讲话和两段最高指示。(1) ‘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是反动的。”

[注 09] 4 月 29 日，146 名支持 414 的干部发表了《致全校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这是清华文革初期的重要事件。

沈书中称这封公开信不是 414 组织策划的，而是中层和基层干部们自己搞的，据说是谭浩强牵头策划，胡大忻执笔起草。

当时清华干部 500 多人，其中中上层干部 156 人，基层干部 350 多人。所谓“中上层干部”是指党委各部副部长，总支副书记、行政各处副处长、各系副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其余为基层干部。

“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清华干部开始参与运动，标志着 414 “解放干部”的主张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支持与拥护；同时也标志着团派“彻底砸烂”的观念遭到广大干部的摒弃，团派在这个观念指导下的干部路线的遭到失败。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干部越来越多，最后竟达到 331 名，占清华干部的一半以上。

在如此短时间内，大多数清华干部力量亮相支持 414，引起蒯大富心中恐慌。

5月3日，蒯大富亲自出马发表《给谭浩强的公开信》，将“公开信”打成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

由于此前，谭浩强发表了《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 100 例》，《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 100 例》（后一篇“100 例”形成的时间还需考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所以蒯大富对谭浩强的态度主要侧重于指责，而把主要矛头指向在《公开信》上签名、并在 414 大会上代表六名中层干部发言的罗征启。

蒯大富说：（罗征启）“这个家伙竟在我们搞革命三结合的关键时刻又跳了出来，煽阴风，点鬼火，对革命小将反攻倒算，挑拨离间。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妄图篡夺我们井冈山兵团的领导权，妄图挤入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罗征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14日团派举行“打倒罗征启”的示威游行。

我认为，这是蒯大富制造“罗征启专案”，后来又发展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最初缘由。

[注 10]“没有大我，何来小我”这是文革前早已形成的固有思维。这与“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思想是相同的。其实从自然现象看，大河是由小河汇成的，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没有个人，哪来群体？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没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地位。将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将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散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痼疾。

但是，在文革前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还给“先公后私”留了一席之地。及至到了文革前夕至文革中，“先公后私”也被当作“公私融合论”而受到批判。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1968 年底毕业分配时填志愿，大部分同学的填的第一志愿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第二、第三志愿仍然重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或者放弃不填。有的同学第一志愿填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第二、第三志愿填了具体地点，当然也不会

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会是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而是主动选择云南、贵州等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即便这样，也会被认为是“公私融合论”，会被工宣队找去谈话，或在大会上遭到不点名的批评。

虽说当时的政策是“四个面向”，但仍然会有大中城市的名额。比如我们班有位工人出身的同学就直接分回上海了。也有的同学社会经验丰富，私下里与工宣队员搞好关系，悄悄做工作，叹苦情，也会得到照顾，分到离家较近的铁路沿线的城市了。

[注 11] 几十年来，舆论界（包括我们自己）一般都认为文革开始时，广大群众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这几乎成为定论。当我们在晚年重新回顾并审视这段历史时，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一）中央高层。除了毛泽东外，中央高层有哪个人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从事后披露的信息，连林彪也不想搞。林彪既没有想过要当接班人，也不想当接班人，更没有想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4日晚，董必武随着周恩来到清华来开大会，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毛主席说要搞，我们就搞了。整个中央高层，大多数人都是董必武这样的态度。

二）广大干部。这早就有结论：广大干部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

三）广大学生。文革是从学生开始的，文革开始时也是学生最卖力的。可是文革不过进行了不到一年，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中就流行这样的顺口溜：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积极参与运动的学生越来越少，逍遥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四）普通群众。如学生家长，就是在城乡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可以回忆回忆，有哪一个家长写信来鼓励子女在学校积极参加运动的？全都是叮嘱子女倍加小心，能不参加尽量不参加，反正不上课，不如早回家。

所以所谓广大干部群众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述 往】

我在文革中的三次“被告密”

俞小平

告密是一种社会现象，其目的是损人利己。文革是告密的多发期，我有三次发现我被人告密了。

第一次被告密发生在1970年。从北大分配离校后，我被分配到山西省繁峙县，报到后得知，我们先要去一个县里的模范生产大队，叫做“鳌子头”的大队参加劳动，然后再分配具体工作单位，在我们之前先分配来的山西省的大学生们已经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了。我和另外两个北大同学一起同行，行李放在大队派来接我们的大车上，跟着大车步行前往。

繁峙县是在一条川地里，北面是恒山，南面是五台山，滹沱河从川地中间向西流过，两边山根相距大约三十里的距离。从县城出来，涉水走过滹沱河，道路在缓坡上逐渐升高，走了几里地就到了鳌子头村。县里管这一队大学生的领队干部把我们三人带到我们要借住的老乡家，安排停当，告诉我们第二天就开始参加劳动。鳌子头村的大队部是个大院子，二十几个大学生每天都先在那里聚齐，然后分配农活下地。

这村里有大约二十个北京知青，一帮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远离北京，远离父母，远离习惯的生活，被打发到这远离家乡的穷乡僻壤，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听说我们是北大毕业生，见到北京来的人，倍感亲切，没几天就混熟了。经常我们吃过晚饭，他们就上门来跟我们聊天，聊北京，聊北京的生活。又带我去他们的住处，拿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珍贵的食品与我共享，翻出《外国名歌二百首》与我一起唱，唱了一首又一首。最多的自然是苏联歌曲，这些孩子们唱得眼泪汪汪。

过了几天，一天晚饭后，一个山西的大学生来告诉我，领队的干部要我去见他。领队是一个五十几岁的本地干部，见到我就说，你这些天干下来感觉怎样？我一边回话，一边动脑子，心想有人告我劳动不好吗？我自幼体弱多病，体力不如大多数同龄人，别人使八

分力气干活，我得使十二分力气才能赶上。我赶紧检讨，说我干农活不如农村来的同学。领队说不是不是，你力气不足，量力而为，这没关系。可是你要注意的是政治立场。我心里一惊，心说什么政治立场？领队接着说，有人反映，你跟知青一起唱苏修的歌曲。你不要再去跟知青唱那些封资修的歌了。他们是知青，没人管他们，你可是个干部，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我放下了心，不是什么重要议题。我赶紧自我批评，保证以后不再跟知青唱歌。我感到领队是好意，不希望我吃亏，但是有人告了状就得处理，才有了这次谈话。

我知道我被人告密了，但是不知道是谁干的。根据我的观察，同来的两个北大同学不会做这样的事，北京没人拿苏联歌曲大惊小怪的，而小地方出来的山西大学生就难说了。

第二次被告密是在1974年。1973年底，我很幸运地从繁峙县调到位位于北京郊区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文革后改名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前进化工厂。刚开始建厂时，厂址还是一片白地，连厂名都没定，就叫“新厂筹备处”，其主要设施是三十万吨乙烯工程，还有一批附属工程。运行管理这样的大规模工程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燃化部从兰州、大连、吉林等地的相关工厂调来大批人马，还是不够，就把脑子转到了我们这批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头上。燃化部向国务院请准后，向北京市要到500人的户口，从各地向石化总厂调人，我就是沾了这个光调进来的。

新厂的设施主要是从日本和美国进口的，那时候做这样的事可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弄不好就能带上一顶“崇洋迷外”的大帽子。可是大家不要说是为国为民，就是为了自己在这京郊的位置站稳了，也不能不好好地大干一场。为了翻译很快就要到来的英语、日语工程文件，厂里开办了几个外语学习班，其中之一的英语班由北京工业大学为我们开办。从文革开始到那时，我已经八年没有认真地接触过英语，我也报名参加。学习班就在北京工业大学校内，那时正是黄帅、张铁生之流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北工大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大都不好好念书，老是想着自己多么革命，在伟大领袖及其文革派的教唆下，今天批判教授，明天炮轰校长，校园里满是大字报。只有我们这个校外来的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英语书。我们课上认真听讲、练习，课后认真做作业，晚上的自习一直上到九点

多钟。四个月的学习班很快就过去了，结业的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感慨地说，很久没见到这么有礼貌、这么用功的学生了，我们教师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在北工大用功读书，周末还是要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的。有一回星期日下午刚回校，带队的干部就把大家都找去开了个紧急会议，说是他的半导体收音机被人偷了。我们班的男士们住在一座宿舍楼顶楼的一间大屋子里，星期六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大家陆续回家，宿舍楼的管理员七点钟来锁门。这中间有大约两小时的功夫没人，也没锁门。我们这位头领先不去校方报案，却擅自决定先审查自己人。他在大屋里带着两个人，把我们这些学员一个个叫进去，坦白交代这段时间都在哪里，有谁作证。一会儿叫到我，我进去说明了我当时在哪里，何时离校，有谁作证。头领问话完毕，让我出去，并要我叫下一个进去。我憋了一肚子气出得门来，对外面等着的人群中的下一个说：XXX，该你去过堂了。二十多人统统过滤一遍，结果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说的，“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也没找出个把人来。”

过了一星期，案子被校方破了，是校外的小偷干的。收音机回到头领手里，他向大家说明不是自己人干的，大家都没事了。我心想，你私设公堂，毫无根据地怀疑本厂职工，你就不该做点自我批评吗？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见头领提高声调说，出了事调查大家是应该的，也好还大家的清白，可是有人竟说接受调查是“过堂”，这样说话是无组织无纪律，说话的人自己要注意影响。我听了大为不快，心想你不是把事情弄颠倒了吧？哼地笑了一声。好吧，你没提我的大名也就算了。你要是敢点我的名，我可要跟你没完，我可要回厂去告你公器私用！不知道这个告密者是谁，告这样低水平的密。

第三次嘛，也是1974年在北工大的英语学习班上。有一天大家聊天，有人提起红军战争时期的事。我想起1957年为中共建军三十周年出版的回忆录选集《红旗飘飘》里的一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那是用来形容当时的红军根据地大转移的过程，红军从江西瑞金万里长征到陕北的事，我就把这句话顺口说了出来。当时没有人表示异议，若是有的话我会把这句话的背景教给他们。我在学习班的同桌是一个车间的指导员，

也就是党支部书记，也是学习班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文化不高，但是为人很诚恳，学习中我经常帮助他，我们关系处得不错。以后的一天他忽然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是不是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句话。我说是啊我说过。他说有人向领队汇报你了，说你为“美帝、苏修”张目。我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把这句话的原意和来源告诉了他。他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了，领队说要送你回厂呢，我去替你解释。结果我没给送回厂，真是亏了他的帮助，让我逃过一劫。我也不知道这密是谁告的。

我知道很多人吃过“被告密”的亏，有些人被批判，有些人去坐牢，有些人甚至丢掉脑袋，我幸而不在这些人之中。写到这里，我想起我应该问问自己：我告过密吗？如果我做过，我就应该忏悔，应该道歉。想了很久，不记得自己做过这样的事。哪位同学记得这样的事，请告诉我，我会真诚地感谢你。■

草于2013年9月13日

是日为林彪坠机纪念日

此文选自《330轶事》一书，该书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1963级同学为纪念入学50周年的集体创作。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三）

——火烧英国代办处，批斗日共代表

陆伟国

一、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

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

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

（6月18日，示威群众在印度大使馆门前）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7月8日，发生香港沙头角事件，香港军警伤亡五十多人。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据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事情是：22日晚10点40分，随着一颗信号弹的升起，围困英国代办处已达十多个小时的数千人冲进早已切断电话线的代办处院子和建筑物内，砸毁家具、用品，点火焚烧，并对英国外交人员及其女眷进行殴打、凌辱。整个事件延续到凌晨两、三点。这时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了。那天，是以北京外语学院的为主，“新人大”也有去的。

两、三天后，我们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这也是到北京后，第一次到东郊的使馆区。现场已经相对平静。栏杆和院墙外有许多军人和警察看护。建筑物的窗户几



乎都已被砸碎，窗框上方留下了火焰烧过的烟灰，（冲击英国代办处现场）墙上到处

是墨水瓶砸上去炸开的墨迹。可见当时行动之“强烈”。我们也是“激于义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香港！”之类的口号，看着目无表情的军警，也没有人再往里面扔石头。

应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是王力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鼓动在外交系统内姚登山一伙造反夺权直接酿成的。这个事件是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践踏人类文明的极端行为，决不是爱国主义，决不是革命行动。它貌似强硬，实质虚弱，不能伤及对方皮毛，反而却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和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过是比阿 Q 精神还要恶劣得多的一种另类表现，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行径。



北京“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群众在东交民巷观看“中国人民银行革命造反派”1966年8月21日张贴的《“反帝路”命名宣言》大字报。

有人把这次事件比作是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而加以肯定。这完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况且，火烧赵家楼也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瑕疵，而不是闪光点。五四运动的实质和精髓，是在于它要发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对这一点却反而很少讲。讲到五四运动，就再多讲两句。

（把东交民巷的牌子用纸贴上，改成“反帝路”）现在有些人，反过来求助于孔孟之道，不加分析和批判地把它当作能包治现代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也是不科学的。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但它不可能改造成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把它称之为“国学”，国家的学说，是不妥当的。别忘了，五四运动的锋芒所向，所要摧毁的正是孔孟之道。五四运动快要一百年了，我们对它的研究、思索和学习也还是远远不够。

二、批斗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之外，其他都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1974年，毛还在世，就跟中国翻了脸，到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段有名的专门称颂“中阿友谊”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这一段至今都不用查资料，顺口溜就出来了。）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一次次地看走了眼，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外（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把日共也宣布为“现代修正主义”。因为1965年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访华时，日方不赞成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话写进联合公报。

尤其是从1966年9月起，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在山口、佐贺、爱知、福冈、兵库等县建立了日共县委“革命左派”，对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插手其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的分裂，于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还是日共书记处书记）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紺野纯一，两党关系彻底断绝。

但是，他们两人在临行前，8月3日，被中方扣住开批判会。上午十点“新人大”方面驱车从学校出发，也参加这次活动，并提前对参加人员作了布置和要求，还专门编排了十几条标语口号。十二点半，批判会在机场的候机厅开始举行。他们两人由日共的“左派”人员也按照中国红卫兵的方式用喷气式，揪膀子，抓头发，在一片口号声中押了出来。两

人当时非常紧张，脸色苍白，汗流浹背，连白衬衫都湿透了。红卫兵和日共“左派”人员纷纷上台发言，批判日共的修正主义行为。口头批判还不过瘾，红卫兵们还上去对两人进行搜身。结果，还从砂间一良的口袋里翻出一只金戒指。这就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生活方式的铁证，这就是共产党人变修的铁证。红卫兵们的批判就更起劲了，不断地高呼口号：

“修正主义必败！共产主义必胜！”“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那两个“日共修正主义分子”低头不语，直擦冷汗。这幕闹剧结束之后，红卫兵们又饶有兴趣地欣赏起由机场革命文艺战士和来华的日本“齿轮座”剧团表演的节目。



但到了第二天，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两人在登机前又被大批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的文章“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说，这次批斗是以“人大三红”为主的。这篇文章所讲的“一个日共党员”就是川口孝夫。不过，据“三红”的负责人不久前对我说，“三红”总部没有参与这次活动的组织策划，是“三红”里面的一些人自行其是。

这儿顺便说明一点，该文对“人大三红”的注释说，“三红”（川口孝夫（1921-2004）是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显然是不对的。后来，《南方周末》更正为：“人大三红”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三者的统称。这个说法也不确切。正确的说法是，“人大三红”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三者的统称。红卫军在“三红”内部存在的时间很短。

我得知有这次活动，但没去，不想去。我知道这种事，去了以后会是什么。到那时，动手，不对。那不只是伤害了别人，更是贬低了自己的人格，污染了自己的灵魂。不动手，更不行，那就是同情修正主义，会立刻陷自己于灭顶之灾。干脆躲过去了，让自己以后面对历史的时候，少一些愧疚。

果然，他们俩先是在候机楼被批斗、殴打。到了机坪上，走向飞机时，被打得更厉害。连在场的日共“左派”人员也觉得过分而往后退了。他俩被迫从成群的红卫兵中穿过，一

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尽管朝鲜机组人员在现场一再抗议，他俩的肋骨还是都被打伤，最后是爬着上飞机的。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俩洗澡换衣服休养，他俩抱头痛哭、不肯下机，说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中国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出现这样的事，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奇耻大辱，我想，谁也不会忘。日共后来在全世界反复谴责中方，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长达三十余年之久，至今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连共产党人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在那个年头，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这种“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1966年夏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往外面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花了那么多的钱，可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先不说，在左倾时期，我们都支持了一些什么人，都和一些什么人在一起？就国内事务来说，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又有多少？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还不一定肯接受。

台湾作家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有些中国人对此颇为反感。我想，这话应该倒过来讲，中国人中确实有丑陋的，而且还丑陋得不轻。只是那些丑陋得不轻的中国人反倒是很有市场，张狂得很，时不时地还能尽情表演，把不丑陋的中国人挡在了后面，给别人以中国人丑陋的感觉。■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六）

——让人揪心的世道

宋翔雁

一、周老师的关照和借调铁三院

自1972年10月下旬回京看病起，文革的进程再也无法像此前那样一呼百应、声势浩大地按中央的部署迅即展开。而有些事只在上层展开，诸如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对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否定等。下边的老百姓无外乎只是跑龙套式的随着各级领导的吆喝，跟着喊喊而已了，真正起劲紧跟的也就是各单位的那些“老左”们了。我在这段时间里就是干私活了，除为家里做了一个五屉柜、一对沙发外，还学了点晶体管电路，在成嘉式、汪铁铭老师的指导下，为自己装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和外接电源。同时还把原本的电子管元器件重新利用起来，装了一台推挽放大的电子管收音机，但利用晶体二极管用桥式整流电路代替了电子管整流，这样就减少了功耗，也给自己补充了一点新知识。

大约在73年夏初，学校的老师们按校领导的指示重新按各系各教研室原有编制组织起来，除跟着参加运动，学习文件、讨论外，还向上级业务部门申请单独或合作展开科研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天周家俊老师来找我，他先问起我目前都做些什么？我如实将自己当时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听后他说道：搞点无线电、学习晶体管电路很好，业务上一定不要丢，今后还是要用的。现在校领导让把教师组织起来，搞些科研活动。但总支书记苏晓洁同志告知：因你的问题尚未下结论，故让我们暂不安排你的工作。但我考虑再三，觉得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所以想请你在这段时间里为地科院勘探所校对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不知你有何想法，能否接受？我对周老师是信任和敬重的，他在文革前也是属于“双肩挑”式党政一起抓的基层领导，但从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是爱护有加的。故我并未问还要等什

么结论这样的问题，估计他即使知道也不便直说，问了反倒让他为难。而且我想自己都承认是“五·一六”了，还考虑什么结论不结论的，所以就一口答应了。但我说道：眼下有点困难的地方是，我手头几乎一点外文工具书包括字典都没有，从事翻译、校对恐会有些困难。听后周老师说：他会设法帮助解决的，并嘱咐我道：此事请你暂不要对外说起，怕有人会反映到苏晓洁处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说知道了，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听后，他也无奈一笑。这也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写实，想干点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还像犯罪分子式的得防着人，真令人哭笑不得！自此后，我就把主要精力用在翻译和校对资料上了。初起时，原始资料和翻译、校对过的稿件，都经周老师的手来传递，一段时间后，周老师就让我直接与勘探所情报室联系，包括选题也由我和勘探所情报室主任商量决定了。因勘探所情报室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学外语的，对专业了解很有限，所以后期的资料选题，情报室主任大部分就让我直接处理了。

大约于74年9月，周老师又对我说：根据法国的资料介绍，铁道部第三设计院（以下简称铁三院）想搞一台多功能全液压车装钻机，为铁道线路的勘测施工服务。他们想从学校借调几名懂得钻探、机械和液压技术的老师参加他们的课题研究小组，共同完成该项目的研制工作。经系和教研室研究后决定，由杨惠民、历美恒（只开始时参加了一些讨论，不久就退出了。具体原因不详）、你和陈纪德同志参加，陈是75届的，基础较差，主要是学习、培养，我作组长但不能长期脱产在唐山工作，因校内的事情还需要抓。说完后问我家里有没有困难，愿不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因我已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专业实践了，特别在前一段的资料情报工作中，我已认定液压技术在工程施工机械应用中的巨大前景，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设计实践是极其难得和十分宝贵的。所以我也没想是否要与昭明商量，就直接答应了，因我相信，昭明肯定会支持我的，尽管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刚一岁多点，加之姥姥还需要昭明照顾，她的家庭负担会很重，但我一点都没有犹疑，我深信她能理解我、支持我，因我已然近37周半了，至今仍一事无成，真觉得过去的荒废太不值得、太令人羞愧了，虽然责任并不全在自己，但今天终于有了机会，自己就再也不能让机会白白地从身

边溜走呀！要说周老师确实是很替下属考虑的，听后还是让我回去再与昭明商量一下。他说道：昭明母亲年岁很大了（已78岁），老二又很小，你长期出差在外，她一人确实有很多困难。你回去后还是和她好好商量一下再定吧！

果然如我所想，回家后我将老周与我讲的事与她讲了，并说了我的想法和周老师让我回来商量再定的劝告。昭明对此也非常感动，但还是坚决支持我参加。应当说，我们两人都是事业心较强的人，都有要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内能够作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愿望。文革前我们都是想努力做到“四个有所”的年轻人，而今有了这个机会，岂能图小家的安逸而捨掉自己的志向呢？！应当说，要争取做到四个有所，昭明比我的困难要大得多。她当时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经决定从专业转向，因她已37周岁，再到井下带学生实习、生产，已有相当困难了。所以她决定转向搞基础课流体力学的教学工作，流体力学是矿山施工、安全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也是文革前系里长期无专人承担的的课程。故文革前该课程的设置和讲授效果都存在很大问题，她曾为别的老师辅导过此课程，深知学生们的糟糕反映和学习时的困难程度。所以她决定转向后，立即得到掘进教研室领导的认可和支持。为了能尽快掌握专业方向对该课程的要求，她主动去钢院和清华大学听课、做实验、并义务无偿为钢院学生（当时尚未招生，均是下边送上来的工农兵学员）授课、带实验，很受钢院一位老的流体力学老师的器重和欢迎。有了昭明的支持，我立即向周老师作了汇报，周老师向我简单说明了近期的安排，并给了我一些此前铁三院在法国考察时带回的一些资料，让我先熟悉一下。

自74年10月中旬后，我即去唐山铁三院一总队参与了钻机总体方案的讨论和研究，并负责完成了回转动力头及气举反循环分离装置的具体设计，参与了钻机的北京性能试验和测试，并于77年初完成了地院研究生部科研报告会论文的编写，后在当年夏季召开的研究生部科研成果报告会上，代表研制小组做了KFY-40多功能钻机研制的论文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较好评价。此后利用假期又花费了较长时间就气举反循环三相流的理论计算和分析作了梳理（完成初稿），请周老师审阅。后可能因高校恢复招生，新专业成立、教材编

写、人员配置、实验室筹建等诸多事务干扰，该稿未能及时得到审查，故最终没能成文，实在有些遗憾。

该钻机的设计有他的先天不足，即在底盘用车的选型上铁三院考虑经费和订购时间过长，坚持用队上已有的一汽生产的仿苏 3 И С-130 三轴六轮越野车，该车不仅功率较小（仅 110 马力——数据不一定准确），而且是汽油机，过载性能差，所以影响钻进效率。加之当时国内生产的液压元器件的质量较差，特别是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内泄大、效率低，故有效功率输出更显不足。但据称该钻机在一总队的生产中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只可惜铁三院在科研管理工作的规范性上有所欠缺，致使该成果仅停留在样机生产和试用中，并未对其进行必要的总结或提出改进意见，直到钻机报废而告终。

但这段实践对我的成长却是有意義的，它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机械装置的设计工作，对我认识自己的能力和不足极为重要，使我更加坚信，在业务领域里，今后无论到何处工作，我都有立足的自信。而且，这次科研中，有关气举反循环的学习和实践，是尔后我在情报所从事部七五攻关项目《多工艺空气钻井技术》中的情报课题研究时，能够获得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我花费不少文字诉说这段经历，目的不在于说自己的流水账，也不在于谈自己得了什么奖。而是想说明一点：像我这样资质有限，但愿做些实事而且比较认真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文革那个年代可说有数千万，但他们却被无情地卷入到没完没了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中，而失去了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才能的可能和机会。这不仅是对人才的轻视和浪费，更重要的是这迟滞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速度，更加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距离。

自 75 年下半年开始，因上级已经下达 76 年将准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因此我们开始忙于编写勘探机械专业用的钻探机械设计教材的相关准备工作，加之钻机相关零部件正在工厂加工，也无需我们长期在那儿蹲守，只是根据需要往返于武汉、北京、唐山之间。76 年 3 月因父母的好友患病住进北京医院治疗，我即从唐山回京，经常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

每次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均要下车观看，并抄录一些震撼人心的诗篇。到医院后，还把所见向老人如实介绍。我只感到他听时心情凝重，但极少跟我说什么，但每次都嘱咐我：看大字报和抄写诗篇时要注意有没有人注意你，若有则要及时躲开，混入人群较多的地方，再伺机离开广场，而不要直接就离开广场。我心知肚明，老人是担心我被人盯梢，而传授我一些他们当年和国民党特务斗智的简单方法。我应允老人一定好好注意，请他放心！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对周总理的生涯、经历、为人、处事等极其崇敬，因此我和昭明决定清明时节，应当带上孩子，去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的遗像默哀、致敬，并送上我们自制的花圈。但考虑到清明时恐会出乱子，故我们全家四口带上自己做的花圈，写上一个四口之家敬献并用包皮严严实实包好后，骑车带着孩子奔赴天安门广场。我们先把自行车停放在首都电影院旁，而且事前就将自行车的执照（即蓝牌）取下，防止被人抄录后查找车主。然后我们全家从电影院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革命英雄纪念碑下，先将自制的花圈放好，然后全家四口面对花圈默悼并三鞠躬。一切预先想好的礼仪完成后，看看周围并没有什么人注视我们，但我们还是各带一个孩子，分开各自转身走向南池子再经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后边的路，从南长街出来，到首都影院取了自行车后，回到学校。第二天，我先到北京医院看望老人后，即乘火车转赴唐山，从而躲过了四五事件！

二、“四五”事件与老公安的嘱咐

从北京回到唐山后，第二天就从新闻联播中得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很多人因此被抓，我还庆幸自己有点先见之明，“躲过”了这一劫。但没过几天竟接到了武汉来电，催我立即返汉。要说还是自己头脑简单，接电后并未想到是因“四五”事件引起，回京后还在家停留一日，也未与昭明打招呼要作好被审查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先去医院看望老人，但他老听说是电报催我回汉时，马上嘱我回校后若问及天门事件的事时，一定不要说自己去过，需要表态时，就按中央的定性表态，并让我切记不可实话实说。这是二十六七年来，他老

人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叫我不要实话实说，老人用心之良苦，对时局艰辛之担忧，由此可见一斑！

到汉后，我即直奔汉口航空路原武汉地校旧址，刚到校门就被原院教务处的头头谢增荣（不知他是处长还是书记，名字可能有误）拦住。他问道：你这是从哪来的？我告知从北京回来的。他又问道：是叫你回来的吧？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的？听后他说道：你先把东西放到传达室里，跟我出去走走。我说：我还得吃饭呢，一会食堂就该关门了。听后，他说：你就知道吃呀？！待会儿我请你不中？我丈二和尚摸着头脑，只好随他一道向地校大门的对面岔路里走去。因平时我从未与他有过多少交往，只是解除隔离迁往沙洋后，与他家隔着一排房舍相邻而居，一次他送来一瓶红颜色的酒给我，并说这是他自己泡的枸杞酒，要我每天喝两盅补补身子，表现出一位长者对年轻人的爱护与关心，让我颇为感动。

当进入小巷后，他问我是谁让你回来的，我说电报上没落款。接着他又问道：四五期间你去过天门吗？我回答道：四五当天我在唐山，但之前去过。他又接着问道：你去的时侯有人看到吗？我回答说：没有。于是他很严肃的对我说道：如此，回去后不管谁问你，也不管别人怎么问，你就一口咬定，因任务在身，这个期间我从未去过天安门。而且，你还可以说，经过抓“五·一六”后，对这类事我再也不关心了！他告诉我，现在形势非常紧张，中央有文件下达，院内有些人又想立功了，你自己要当心，别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记住一年多受的罪。走到一家餐馆前，他真让我进去请我吃了一顿饭，天都黑了，我们方从饭馆回到学校。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公安，从北京公安局退下后，即转业进到地质学院，一直在教务部门工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他对我的关照却让我永生不会忘怀。可惜好人不长寿，他因严重的哮喘病，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病故，当时我正在武汉给学生上课，未能送他一程，回京后，我曾前往他在高二楼的家，向他夫人刘女士表达了哀悼之意，祝他在天之灵安息，也希刘女士节哀，保重。

三、总支书记的嘴脸

第二天我到系办报道，并询问为何事催归？系办让我去总支找书记询问。当我进到系总支办公室后，书记苏晓洁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怎么今天才回来。我告知昨晚就到了，因已下班，今天才来报道。他又说道：电报不是要你速归吗，怎么要这么多天？我没好气的回道：我一天也没耽误，当天就赶回北京。但当晚37次车没有卧铺了，只能第二天走，你自己算算！面对我不客气的当着众人面的回答，她也只能忍着。但她接着就板起面孔对我说道：根据中央文件的要求，在四五事件发生期间，所有在北京或经过北京的人员，必须按要求逐日将自己在京期间的行踪记录下来，交有关部门审查。你必须按要求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要知道你的“五·一六”问题还未做结论，不要再搞出新的问题来。写好后明天交到总支来，其他时间和探工系在地校的人员一起学习文件、讨论领会精神，接受审查。

因是中央精神要求逐日交代在京和经过北京的活动，我是不能抗拒的。但我也吸取了抓“五·一六”事交待的教训，加之我在那儿、干什么等都无地院熟人知晓，故按老谢的意见，一律省略或模糊处理，免生事端。因此，我从三月二十二号填至四月七号，除二十七、二十八日回京度假外，其余时间均填写在唐山工作。材料上交后，苏看毕也无话可言，但不死心还问道：你把证明人填上。唐山那边我填了庄耆、庞瑞珂二人，前者是项目铁三院方面的负责人。北京的我问苏只能填刘昭明行吗？因我是回家度假，就在大院里也没空到别人那去，谁能证明？苏想想后只好说那就先不用填了。

材料上交后，我一点不着急。因我觉得这种材料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在成千上万的人丛中，如果你不是被当场抓住，或因什么很大的动静，引起监视方的注意而被拍摄下来，再经一点点鉴别，是无法查出究竟的，加之类似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警方也不可能为地院去费力查找。至于像铁三院去函调，在当时那种人心所向的环境下，像苏氏那样欲认真查对者，已少而又少。所以当时我在汉口接受审查时，心里很笃定。我只是在想，苏晓洁这类人的心底深处是极其龌龊的，仅举一例可知：73年夏，就因我的问题尚未作结论，她

通知周老师暂先不要给我安排工作的同时，有一天他突然来学十二楼我的家中“看望”（当时好像昭明刚生老二不久），在聊了一会后，突然指着她坐的沙发问道：这是你自己打的吗？真的很好看也很舒服呀！我还客气地说道：嗨，还说得过去吧！接着她又说道：我那儿也有些木料，你也帮我打一对吧！面对她的突然请求让我一愣，竟没有想到应如何回她方好。一方面我不愿意为她这种人帮忙（她也是干校里的“五朵金花”之一），另一方面，周老师刚给了我很多资料，我需要时间翻译、校对，加之老二出生不久，家中事情很多，也没有时间再做木工，而且我答应为迎接女儿出生，给她们母女打一个五屉柜做礼物还没做好呢，很难再帮别人做活了。

在我琢磨着如何答对时，她却迫不及待地说道：怎么，不愿帮呀？她的这话倒反提醒了我该如何回她，我即回答道：苏书记，不是我不愿帮您。因周老师通知我，因我的问题还没做结论，暂不安排我的工作。故这时我要帮你打家具恐不大方便，既会引起别人对您的议论，也会说我别有用心。这对双方都不好的事，我觉得还是暂时放一放为好！无疑，这话让她碰了个软钉子，加之她酷好整人拉资本，岂能有机会不报复的道理！

就这样，我在汉口接受审查至月底，最终只能不了了之。我于五月中返回唐山，问起庄、庞二人前一段时间有无来人向他们调查我四五前后的情况时，他们都说没有。当他们反问我因由时，我告知被审查一事。他们均表示，这世道真让人揪心，还是多加点小心好。

六月中接到北京电报，言老人病危，让我速到北京医院。但当我赶到时，老人已咽气身亡。我当即赶去停尸间看了遗体，后来又在八宝山参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尽管规格很高，评价很高，很多老同志都去参加了。但我深知老人内心的苦楚和忧心。

事情是这样的，当他知道我对文革中被整颇有怨言和看法时对我说道：我过去的一名交通员，是延安派过来的。文革前是景德镇的市委书记，文革中被揪斗打断了双腿。但他毫无怨言，仍继续为党工作。你要向这些人学习，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要有思想准备。老人一席话，我很受启发，这与何部长在水边时对我所言的：革命嘛，哪有不挨整的。其道理不是同样的吗？确实，共产党内有很多很多老同志，在经历了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之后，

仍然不舍弃革命、不舍弃党，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值得后来人敬仰。但我不愿，也不敢向他们问起，难道党内斗争就非得这样你死我活吗？！难道只有这样逆来顺受，才称得上是共产党员吗？！难道党内斗争不是唯理唯实而只能唯上吗？

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答案，作为一个党外人士，我也无须去找这一答案。我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老实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按老人生前的嘱咐，教育好孩子（他很喜欢我的儿子，多次对我和昭明说过：小牛本性淳朴，要很好保持，不要娇惯），也就不辜负他老人家二十六七年来对我的关爱了。面对我走过的曲折人生之路和孩子的现状，我今天可以告慰老人在天之灵：我没有辜负他对我和孩子的祝福和期望！■

【文 摘】

我在文革的漩涡中

——清查“五·一六”运动

聂元梓

1970年1月中央领导人称王、关、戚等人为“五·一六”

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当时公安部抓捕了“五·一六”成员，这个组织活动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后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把“五·一六”问题大大扩大化了，把反总理、反军、反对新生的革命政权等等都归为“五·一六”活动。1968年中央成立了“五·一六”专案组，组长是陈伯达。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倒台了，吴德任组长。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

部等单位代表时作了长篇讲话，这些讲话把王、关、戚，以及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一伙都称之为“五·一六”，说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列举了他们的种种罪行。讲话还点了许多其他人的名字。这些讲话在许多单位作了传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掀起了一个清查“五·一六”的高潮。另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也在1月中旬作过两次讲话，披露了周景芳一伙把持北京市革委会多个部门，干了许多坏事的情况。

在很长的时间里，王、关、戚和吴传启一伙到底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到底查清了什么，王、关、戚的背后还有些什么，老百姓都一无所知，也无从猜测，很是郁闷。这是我、孙蓬一和北大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我们很希望能揭开王、关、戚一伙的内幕。现在，中央领导人突然作了这么长篇的讲话，揭示了许多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事情，我们在震惊之余还有点兴奋。

北大早在1967年初就开始反对关锋、吴传启一伙了，但绝对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还是“五·一六”。过去，北大一向是把王、关、戚、吴传启一伙同张建旗那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严格区分开来的，称前者为反党集团，称后者为“五·一六”。两者在行事和思想方面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不是一回事。

孙蓬一等人要在北大清查“五·一六”

当很多单位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清查“五·一六”时，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们宣传队一进校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早就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我们学校不搞“五·一六”，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现在搞教育革命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对于宣传队这样做的背景和理由，我们无从了解。但对迟群、谢静宜为代表的工军宣队，把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校文革一派掌权”，我们早已表示不满。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等人写了一张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

集团》的大字报（简称一·二七大字报），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林副主席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革命在前进，革命要继续。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现在首都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正在掀起一个坚决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最丑恶、最阴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的最大隐患。这些家伙在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杨、余、傅、肖华的培植和操纵下，以极“左”和极右的面目出现，把反革命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反对周总理，不只是反对周总理，目的是妄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周总理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忠心耿耿地工作。他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党有毛主席是最大的幸福，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幸福，有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周总理同样是幸福。因此，反对周总理实质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周总理也是反革命。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黑手伸得很长。不仅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不仅机关有，学校有，文艺界有，部队里也有；不仅高等院校有，北京大学也一定有，而且是“五·一六”的一个重要据点。不妨让我们简单地重温一下我校三年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历史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几个回合的大搏斗，哪一个在北大没有激烈的反映？特别是“五·一六”的后台王、关、戚所掀起的极“左”思潮的泛滥和“五·一六”的反革命活动在北大尤其猖狂。请看，在北大：

早在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时期，就和周英、卢正义、徐非光、谭厚兰、李冠英之流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有；

“五·一六”活动猖狂之时，策划、组织成立北大““五·一六”公社”的有；

在“五·一六”头头授意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机密档案的有；

经常向林杰、周景芳、穆欣、洪涛、王恩宇之流请示、汇报，和王乃英特务组秘密联系的有；

直接参加周景芳操纵的“干联站”黑活动的有；

参加“五·一六”骨干分子八月黑会的有；

鼓吹“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的反动谬论，煽动大抓“军内一小撮”的有；

“五·一六”匪团猖獗时期，把北大革命群众张贴的“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革命大标语，拍成照片，送交“五·一六”匪首，作为“老保”、“罪证”邀功请赏的有；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甚至当王、关、戚倒台之后，还为王、关、戚鸣冤叫屈，恶毒咒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令人绝对不能容忍的滔天大罪的人，有。

仅从以上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北大“五·一六”分子的活动是何等猖狂吗？请那些闭眼不看事实的人看一看，想一想，现在是到了彻底清算“五·一六”匪团的罪行，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目前，在如何对待“五·一六”匪团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

有一个立场问题，站队问题。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就会看到，我们同“五·一六”匪团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要“乱敌人，树队伍”，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精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通过清查“五·一六”，真正清理阶级队伍，划清阶级阵线，彻底揭露批判王、关、戚，杨、余、傅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灭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威风，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如果你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五·一六”匪团的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那就必然会滑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当了“五·一六”的防空洞，起着掩护、包庇“五·一六”的作用。这样就必然看不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就必然缺乏对“五·一六”的仇恨，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比热爱，就必然不能真正放手发动群众，不能真正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其结果必然是黑白不辨，是非不分，敌我颠倒，混淆阶级阵线，长阶级敌人的威风，灭革命派的志气。因此，抓不抓“五·一六”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问题，是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抱什么态度的大问题，是站在哪一边的大问题。当前，抓不抓“五·一六”，坚决不坚决抓“五·一六”，真抓“五·一六”还是假抓“五·一六”，是革命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游移和动摇都是极大的犯罪！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必须复杂一点，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分析一切、指导一切、批判一切。

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林副主席指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周总理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坏人）”。江青同志说：“‘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这些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为我们规定了抓“五·一六”的指导思想、

路线、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坚决照办。

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在我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正确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打一场围歼“五·一六”的人民战争，不把“五·一六”彻底查清，绝不罢休。如果谁对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反动家伙，不揭发，不批判，不斗争，甚至以种种借口给他们开脱罪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同情、包庇“五·一六”，站在“五·一六”一边。有些人至今还不觉悟，这样下去不是太危险了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像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像隐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团结，共同对敌，随时揭露一切妄图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诡计，那么不管敌人多么狡猾，隐藏得多么巧妙，攻守同盟订的多么牢固，我们都一定能把他们统统挖出来。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打倒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坚决批判王、关、戚之流的极“左”思潮！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哲学系

孙蓬一 赵正义

宋一秀 高云鹏

韦全贵

一九七零年元月二十七日

鲁莽的孙蓬一等人没有认识到，文革的群众运动早已结束，现在北大的当权者是迟群等人，他们带着耀眼的光环进入北大，北大已成为他们的天下，他们自认为手眼通天，故而作风霸道，说一不二，群众中若有人提什么意见和看法，对他们说三道四，那就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就是大逆不道，就得除之而后快。

现在看来，大字报本身缺陷甚多。首先是盲目跟风当时中央发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不知道其中深藏危机。这场运动的目的已经不是王、关、戚及其后台，而是指向群众的，包括反对过王、关、戚的干部群众，范围非常广泛。其次，孙蓬一等人盲目跟风的结果，使自己对“五·一六”的认识偏离了原先比较符合实际的轨道，一些似是而非、并无确实证据的现象被拔高了，当成了“五·一六”的表现。第三，大字报语气激烈，上纲很高。于是，这张大字报立即成为打击的靶子。孙蓬一等人一下子撞到了枪口上。

大字报贴出后，很快遭到迟群一伙的严厉打击。迟群等人认为：“大字报的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并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围攻、批斗。北大工军宣队从不抓“五·一六”，到大抓“五·一六”，迟群等人用无耻的政治手段来对付孙蓬一等人：你不是要抓“五·一六”吗？好吧，你就是“五·一六”！

在随后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我和孙蓬一都被开除党籍，并且被戴上“五·

一六”分子的帽子。

北大清查“五·一六”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北大“五·一六”专案重点审查对象共117人，重大事件共九件。这些重大事件有：反军、乱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谢富治；围困中南海；“午门抗缅”大会；007密令；组织人员到国务院各部门调查；西山游行；武斗及死人问题。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到1973年2月，北大九件重大事件及涉及到的117人的问题已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两人，胁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13人，被蒙蔽、犯有政治错误的14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排除的16人，其他问题72人。认定反革命分子的聂元梓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由群众监督，以观后效，报上级批准；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孙蓬一是助纣为虐、民愤极大的从犯，决定戴帽子，劳动改造。

事实上，工军宣队进校后，从1968年秋天到1978年春天，我挨整达十年之久，十年来一直被隔离审查。1968年国庆节以后，我和孙蓬一等人集体受隔离，白天受批判，晚上还可以回家住。到了冬天，全校的教授、干部绝大多数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也在其中，住到哲学楼，日夜受监管。后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在当时的那些“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中间，我是“坏人中的坏人”。军工宣队的领导魏银秋说：“你是臭老九的总后台。”其实，我的境况比那些“臭老九”更坏，我是重点被监视的。

1970年6月，工军宣队让我从干校回北京。在火车上，我是被两个男子汉押送的，上厕所都有男人跟着。押回学校以后就被关在38楼，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还罚我打扫厕所。哲学系38楼的几个厕所，我都打扫过，我成了打扫厕所的“专家”了。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就是关于我二姐聂元素的血衣的事。文革中，聂元素也遭到残酷批斗。一天，二姐托人（此人是在二姐家帮着照顾我母亲的，是烈属）带来一件血衣，说

让放好，并说如果她死了，一定是被别人害死，自己绝对不会自杀。这件血衣后来被宣传队抄家时抄走了，认为我保存这件血衣的行为是现行反革命。

给我按的“罪名”很多，什么“反军”、“夺权”、“武斗”、“杀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随着不同时期就又给我贴上新的标签。林彪倒台前批我“反林副统帅”，“九一三”事件后批我“积极追随林彪集团”。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的罪名又增加了“配合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王连龙、迟群、谢静宜派人逼我写检讨。反正，从1968年10月起，只要有风吹草动，我都是在劫难逃。我的罪名，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五·一六”骨干分子、“武斗后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林彪，搞串连”等等，这下子，又把我划拉到邓小平一边，继续批斗。别人倒霉的时候，我是一定会跟着倒霉，尽管说我跟那些人是八杆子也打不着、连不上。

工军宣队对我的批判，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在地学楼开了一个批斗我的大会，一个大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让学生们围攻我，叫我交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谢富治的“黑材料”，我没有交。从晚上六点钟吃晚饭时把我拉到批斗会场，站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中间一分钟也不让我坐下休息，也不让吃饭，连一口水都不让喝。他们轮班睡觉，轮班吃饭，这一帮人来了，批一通走了，再来一帮人，再批一通，他们是吃饭休息都不耽误，用“车轮战术”折磨我。我站得坚持不住了，双脚稍微歪一下，他们就用皮鞋踢我的脚，让我一直站了十几个小时。

大会小会批斗了我多少次，我早已数不过来了。开始我还数着，数到一百多次时，我也没有心思再数下去了。谢静宜在大会小会上批我，侮辱我，谢静宜的嘴跟刀子一样厉害，伤人得很，她斥责我多少次，恶毒地辱骂我。我经过的批斗太多，受到的侮辱太多，记都记不住了。但是内心深处的伤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

我检查了些什么

这一节所用的材料，是清查“五·一六”时我写的草稿。因为时间久远，有些纸张受损，有的残缺不全。但其它基本维持原貌，没有大的改动。幸亏有这些故纸，帮我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现把它们录在这里，供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们参考。

和陈伯达的关系

1. 1967年1月22日下午，在人大会议，其他中央首长未来，开会之前，陈伯达对我说：你对党是有功勋的，我非常爱护你，对蒯大富他们，也是这样的心情，总想和你说几句。你要深入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懂得革命的荣誉得来是不容易的，保持也是不容易的。不要随便地接触一些人、接触一些组织。在这个时候，坏人是最高兴利用你的。你知道，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也是关系到北大的荣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说话也说不好。总之，你要谨慎，不要随便的接触人，有什么问题，多同我们联系。革命的考验是严峻的。

2. 陈伯达挑动支持我反谢副总理，破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1967年3月28日，在大会堂，陈伯达问我：红代会最近干了什么了？我说，今天下午刚开了一个核心组的会议，分析了各个学校运动的发展情况，分3类。准备再进一步对各校做些促进联合的工作。接着他说：搞红代会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叫你在市革委会中多起些作用。叫你做副主任的工作，就是这个目的。你是红色政权中的新生力量。我们是很重视你的。你是从群众中来的，代表群众的。谢副总理这个人很好，郑维山、傅崇碧、吴德这些同志都很好，但是他们都有老脑筋。比如谢副总理吧，他过去是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总会受些影响吧。我这不是叫你反谢富治，是叫你了解这个情况，更好地发挥你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这样，团结在一起，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有影响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旧的东西，在同红卫兵接触中，我就受到很大的教育。

我听了陈伯达的谈话，最突出的觉得谢副总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长期工作的，我就想进一步知道这个情况。回家后，我找了聂真，知道他同谢副总理过去在一起工作过。我问

聂真，到底谢副总理怎样？聂真说：过去是邓小平重用的干部，并说谢能带军队，能做地方工作，这个人比较淡定，在党的斗争中，他不轻易表态，都是在最后再表态。这样使我对谢副总理，产生了怀疑，“长期重用”，“总会受些影响吧”，认为陈伯达的意见是对的，我应当在市革委会中进行“监督”、“发挥作用”。这样，在4月8号，谢副总理召开会议，宣布市革委会组成人员的时候，我曾给蒯大富写了一个条子，告诉他，谢副总理是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干部，是邓重用的，能文能武的干部。我把这个内容告诉他的目的，是叫蒯大富也要在红色政权中“发挥作用”，“进行监督”。我也对孙蓬一谈了陈伯达、聂真的话。

3. 67年4月14号，中央文革接见后（会上批评了我们），陈伯达看到有机可乘，很合他的心意。开完会，刚回到家里，他就打了电话给我：你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你不要再检讨了，有意见可以提么。不要因为犯了错误，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可以提么。我反了谢副总理，犯了罪，反而得到了陈伯达的表扬，我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有意见可以提吗。所以，我就更觉得，这次反谢副总理，是因为处理地派开车到北大闹事，处理不合理所引起的，而且，进一步想，谢副总理的确像郑仲兵所讲的，他是支持洪涛的，因此，他就是袒护地派。

4.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陈伯达谈到北大叫周培源当校长时，他说：“北大的体制，还要研究，不一定在学校都搞革命委员会，就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另设校长制。你主要在市革委会起作用，市革委会工作我看还是搞不上去。北京市也比较复杂，我是愿意叫你参加核心组的，这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作用。”我说：我还参加核心组呢？什么都不知道，连要个市革委会名单都要不到。”陈伯达说：“啊，竟有这种情况，谢副总理应该依靠你嘛。”我说：“他依靠的是周景芳和学部去的那一堆人。”陈伯达说：“你们都是群众的领袖，是革命造反的代表。北京市革委会要搞好，就是要依靠你们这些新生力量么。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造，过去苏联的那一套不行了，国民党的那一套我们更不能要，就是十七年来的那

一套掌权经验，也是都不能用了，现在，我们要制造、总结一套自己的掌权的经验。当然这就必须依靠你们。”

5. 1967年7月3日下午，在机场上，陈伯达给我们（蒯大富、韩爱晶）谈了教育革命之后，对我说：“我已经同丁国钰谈了，叫他找你，同你商量。他们找你没有？”我说：“没有，他们还能会找我来谈什么，他们什么也不会同我商量的。”我对陈伯达发泄对市革委会的不满。陈伯达说：“真的？他们对你是这样吗？”我说：“就是这样。”陈伯达说：“那问题不在丁国钰。”我说：“我早就认为问题就是这样。”陈伯达笑了笑没吭声。从这以后，我认为中央精神对我是明确的，就是谢副总理没执行。这时，我不仅对谢副总理更加不满，我对丁国钰也更加不满起来，在群众中不仅攻击谢副总理，也攻击丁国钰。

6. 1967年7月12日，接姚文元同志的那天，我问陈伯达，建工学院在中南海西门揪斗刘少奇，听说是中央首长支持的，戚本禹也支持，现在又去了许多学校，到底是不是中央首长支持的？陈伯达说：“凡是群众的行动，都是符合大方向的。”我说，那我们去了。陈伯达说：“那这由你们自己决定。”我回校后说，是中央精神，要紧跟。

7. 1967年9月（还是10月1日，时间记得不准确）北航开复课闹革命大会，大部分高校学生去参加，陈伯达亲临指导。这天会议我没去，陈伯达派他的专车来接我去参加大会。当时我正在校内参加劳动，不愿意去参加，但是陈伯达派来的人说：“陈伯达同志告诉了，一定叫你去参加大会，说你不参加，大会就不开始。”这样，我就去了。去了之后，陈伯达一定叫我在大会上讲话，我无论如何不讲。陈伯达说：哪怕你说一句话呢也可以。我觉得陈伯达如此重视我，我就真的在大会上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天大会开得很好，现在散会。”但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把我的讲话登出来了，并且报导复课闹革命的学校把北大列在第一名。这在当时一部分群众中影响很大，认为这是中央对北大的态度。对比谢副总理，就完全不同了。我和孙蓬一在群众中用此事来议论攻击谢副总理，破坏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威信。

那天会上，陈伯达还对我说：你是有影响的，你不来北大谁代表，北大不参加这个会，

这不能算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的开始。我听了心中很舒服。后来，恰巧在10月27日，市革委常委会上，谢副总理问我，北大开学了没有？我说开学了。谢副总理又问，现在到底有几个学校开学了？我说：听今天早晨新华社广播11个学校开课，没有北大。谢副总理说，那这是老稿子吧，文教组同志说可能弄错了。从此，我又记起了一笔账，市革委会就不把北大放在眼里，怎么能不弄错呢。

就在这次，我见到陈伯达，我还向他谈了我对谢副总理的看法。我说：“王、关的问题中央揪出来了。周景芳学部人家也要揪他。谢副总理还是说他有一点派性，不得已才交给学部的群众弄走了。谢副总理显然是袒护王、关的爪牙的。”陈伯达说：“市革委会的工作是需要加强，那个摊子也不小。北京的工作不好搞，但是现在没有人。”我说：“为什么不充分发挥吴德同志的作用？吴德同志有一次对我和李冬民讲，他分工只管财贸，他情绪很低，给我们俩说，要想找个果树园去看看。问他事，他说他没有分分管，要叫问秘书长。”陈伯达说：“这个情况我还不清楚，这你要问谢副总理。”因为我一直同情吴德同志在市革委会的地位，对周景芳横行霸道不满意，周景芳揪走了，吴德同志的处境还是没有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陈伯达这样一说，我认为，的确问题不在别人，谢副总理可能就是王、关的后台。我也常常向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骨干、头头们说：周景芳揪走了，王关戚倒台了，吴德同志还是那个受气样，市革委会没变化，准有问题。

8. 1968年3月，在高校学习班，我们反谢副总理实际上是陈伯达支持的。2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陈伯达，我说：“高校学习班搞革命大联合，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既然高校都集中到一起，又不让抓分裂高校的黑手，王关戚的问题公开了也不让搞，周景芳分裂高校的坏事也不让搞。为什么不让批判周景芳，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就能实现革命大联合吗？我们对谢副总理有意见，在学习班给谢贴大字报，算炮打谢富治吧？”陈伯达说：“这不算。机关内部提意见，什么时候都可以。这话你不要说是我讲的，还是你们自己讨论决定，如果是群众的意见，你也不要压制。”

我本来就怀疑谢副总理是王关戚的后台，这是陈伯达知道的。学习班越不让斗周景芳，

我越认为这里有问题。所以决定从这里开始，揭高校派性斗争的盖子，既解决了两派的分歧，又揪出了后台谢副总理。有了陈伯达的这个指示，我们心中有了底。只要我掌握好，不要叫大字报上街，在学习班闹翻了天，也扣不上反谢的帽子。所以，我们几个头头，开始讨论从学习班问题开始，进行反谢副总理的阴谋活动。当师大、人大和学部大字报上街以后，我又给陈伯达打了两三次电话，又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大字报要不要上街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觉得反对谢副总理，是个大问题，特别有我们第一次的教训，这次我一定要严格掌握好，一定要请示了陈伯达以后才能决定。这次，陈伯达狡猾的很，他叫我们轰起来了，他不吭声了。他也不露面了，叫他的秘书王文耀来回答我。王文耀说：“首长没有表态。”实际上反谢的火是陈伯达支持搞起来的，火烧大了，他没表态就是一个表态。如果不是因为3月19号谢副总理主持声援越南斗争的大会，北大必定上街大反谢副总理，我会对党对毛主席犯下更加严重的滔天大罪。在这个形势下，我又打了两三次电话，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交陈伯达。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大，要上街了，这必须请示，公社群众都知道这个问题。

9. 1968年3月8日凌晨，江青和陈伯达找到我到中央文革谈话。我把清华大学414关于陈里宁的材料（是反谢副总理的），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很高兴的收下了。陈伯达这个态度，就是支持我。使我想到了，这和二月底的那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天晚上，去中央文革谈话，是陈伯达亲自打电话找我的（过去都是秘书），也是亲自派他自己的车来接我的。他向我道了歉，说他批评是不得已的（指67年6.5讲话），实际是在中央经常说我好话的，表示对我的关心和尊重。临走的时候，陈伯达小声对我说：“傅崇碧还是个好同志，他派那个人（哈斯）不好，你的意见是对的，但你不要把他们混到一起。就是叫我不要反傅崇碧。”3月9日，陈伯达连忙批示处理哈斯来北大的问题，3月10日周副政委来北大道歉，实际是解决、掩盖和傅崇碧的关系。

10. 3月8日，江青对我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但由于陈伯达的黑手在操纵着我，完全把江青指示的精神领会相反了，所以回高校学习班，继续反了谢副总理。这是我对江青同

志的不忠，完全辜负了江青同志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11.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大会上，我看见了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我知道他是天派的观点。陈伯达告诉过我，他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天派，一个是地派。所以，我见了王文耀，就对他很好。王文耀说：首长对你很关心，对你很惋惜，觉得你怎么反了工人宣传队（指第一支宣传队进校）。我说，没跟上形势，但也没怎么反宣传队。我说请你代我问候陈伯达同志好！有一天开主席团会议的时候，陈伯达见了我，说王文耀带的话告诉我了。他问怎么样？我说群众对我进行了批判。陈伯达说：“你怎么搞的，若不是毛主席保你，这次你还不能参加九大会议呢。”我说：“自己不够条件，犯了许多错误，辜负了毛主席。”陈伯达说：“听说北京市选红卫兵代表有年龄限制，是这样吗？”我说是这样。我说中央有规定吗？陈伯达说：“中央没有规定。”这样我认为谢副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为了达到报复我的目的，违背中央的规定，自己附加条件，但又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反他的人没事。所以，自己就对谢副总理心怀不满。在九大以后，认为谢副总理插手北大问题，想借工人阶级之手，把我搞掉。这样，就在陈伯达对我的一再毒害、欺骗、挑拨下，我把忠于毛主席的谢副总理视为仇敌，一反再反。九大以后，还大整谢副总理的黑材料，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北京市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当了大反党野心家陈伯达的反党反毛主席的马前卒，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

12. 就 6.5 讲话之事，陈伯达多次道歉：

（1）1967年7月10日晚，在市革委会向我讲过；

（2）1967年9月北航复课闹革命的大会时讲过；

（3）1968年3月8日江青、陈伯达接见时讲过；

（4）1967年8月3日市革委会会议后，陈伯达对昨天关锋就张超之事批评我，向我道歉，并说5月27日的批评，不要当回事。

对抗江青的指示

1967年9月1日江青在接见会上批评了我。说我的助手不好，出了坏点子。回来以后，孙蓬一极为不满。当时周围的几位同志姜同光、李清崑、陈葆华、魏杞文、夏剑彘，也批评我没有为孙蓬一承担责任，为什么不在会上向江青同志解释。然后讨论决定给孙蓬一写一个材料，向江青同志写一封信，说明孙蓬一是好同志。我向有关人员作了布置，向李讷同志反映孙蓬一的情况。从此，我决心保孙蓬一。在又一次的接见会上，我向江青同志说，孙蓬一没有给我出点子，错误是我自己的。当我保孙蓬一的时候，江青同志又批评我说：“你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还保他呢。”但我不听，对抗江青同志的指示，随后，还布置为孙蓬一整材料，给江青写信并派人向李讷同志反映孙蓬一的优点。直到1968年3月，在一次接见会上（高校学习班），我还公开保孙蓬一，说他是好同志，卫戍区整孙蓬一的材料不应该。我们还印发了传单，说孙蓬一是“坚定的左派，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公开对抗江青同志的指示和批评。

“九大”后，在选票问题上议论江青同志。我对姜同光、孙蓬一、王茂湘（可能萧灼基也听到了）说：没想到在选举问题上，还有人捣江青同志的鬼，叶群同志比江青同志还多一票。部队的同志对叶群同志印象好，对江青同志在作风上有些看法。但是二月逆流的那些人参加九大，对江青同志是恨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同志是有功的。

1968年3月29日，北大武斗后两三天，丁国钰、李钟奇同志到北大来，传达江青的指示，说江青同志叫你向井冈山兵团作检查。我说：检查什么？他们说不知道。你看应该检查什么就检查什么吧。当时，我怀疑丁国钰、李钟奇同志是偏向井冈山的。我不相信他们讲的是江青同志的指示。我说：我不能检查。井冈山兵团刺伤我的凶手，还没有查出来。我不能带伤向他们检查。后来，我请示了温玉成同志。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温玉成同志说是江青的指示，但我说现在没有条件检查。这是严重对抗江青同志。因为我抗拒江青同志的指示，使北大武斗不能迅速解决，形成了长期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落后局面，严重破坏了主席的战略部署。

反康生

1967年2、3月间，蒯大富反康老，受到中央文革批评后，曾告诉我他受了批评，孙蓬一知道后说：“我看是江青同志暗示小将反康老。”我批评了他。

1967年7、8月间，孙蓬一同我议论王、关有没有后台？谁是他的后台？我说我不知道。孙蓬一说：“我看康老支持王、关。”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看王、关不反康老。我说：“在王任重的问题上，曹大姐也没有看出来。那时，王任重找我谈话，都拉着曹大姐。在十一中全会时，曹大姐还告诉我和王任重多联系，有什么问题请示他。”我还说徐非光是常找李欣（康老的秘书）的，同时康老外甥还叫徐非光给他管过。孙蓬一说：“康老周围都是地派的，我看康老是会听他们的话的。”

以后，孙蓬一认定康老是王、关的后台。我也在怀疑。1967年9月，李广文大字报出来以后，孙蓬一说李广文大字报贴的是事实。他过去知道康老的情况。我说李广文到中央文革工作，不是康生同志让他去的，还是同意他去的？孙蓬一说：“我看，康老是抛出了李广文、保自己。李广文不满，就写了大字报反康老。”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外边就有这个传说。后来有学生问孙蓬一要反击李广文大字报，孙蓬一不让反击。

1967年9月红旗杂志十四期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后，我又同孙蓬一议论过康老。他说：“我还是怀疑康老是王、关的后台。”我说：“这个问题很难说，王、关是经常把矛头指向陈伯达、江青同志。有时候戚本禹嚣张地就不把人看到眼里，看样子他们不反康生同志。”孙蓬一说：“五·一六”这个组织搞清楚了，后台就揪出来了。”他说：“我总是觉得康生同志是支持他们的。”

1967年11月左右，人大三红总部来了一个女的（不知道名字，但知道她是人大三红的）送来一个条子，上边写着：“康生同志说，潘梓年是好同志，吴传启要保。”我找孙蓬一、姜同光来，问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怎样处理？孙蓬一说：“我认为康生同志就是保他们，是王、关的后台。可以把这个条子，还有赵建文他们掌握的别人交待的材料，加上我们的观点，报给中央。”我说：“王恩宇的交待材料就那么一句话，同时也不能用王恩

字的交待，作为报告的根据。现在说康生同志是王关的后台，没有大根据。”姜同光说：

“我们就这样报吧，先把人大三红的这个材料报一下。”后来，让赵建文去人大了解一下情况，只报了人大三红送来的一个条子的内容。这样报中央以后看看有什么意见再说。是直接报军委的。

1968年3月，陈伯达、江青同志找我谈话以后，我回来传达给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夏剑豸、陈葆华、王茂湘。当问到中央文革那些人员，江青同志说“那还是经过一个地方审查呢。”孙说：“你看中央组织部早就瘫痪了，那还不是经过康老他们审查过的吗。”我当时没说什么，但我心中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指的康生同志那里。从此，我心中增加了对康生同志的怀疑。

1968年8月，宣传队进校后，我说宣传队这样搞，就是扩大化。对我搞轮番作战，跟延安整风时扩大化一样。这时候了，还搞这一套。（曾在高校学习班对姜同光、王茂湘、孙蓬一、卢平等人讲过。）

68年在高校学习班时，一次回北大的路上，孙蓬一对我讲：现在让揪王、关、戚的后台，我看这后台不好揪，你说谁？”我说：“谢副总理也像也不像。因为谢副总理有时是听戚本禹的，连周景芳的话，谢副总理都是听的，周景芳说话对谢副总理都挺硬，他还能作了他们的后台？”孙蓬一说：“我看康老有点像。”

69年九大以后，我对孙蓬一、姜同光、王茂湘、萧灼基说：在会议期间，曹大姐对我挺冷淡，对丁国钰挺热情的。我说一次我同康老说话，没说完他就走开了，也没同他握手。中央其他首长，总理、江青对我却挺热情的。陈伯达秘书王文耀还说，中央首长对你都挺关心的。以后，我就怀疑康老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自己就主观的猜想，并对孙蓬一、姜同光、王茂湘、萧灼基说：“过去，我对康生、曹轶欧同志对我的帮助，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其他首长讲的不够。可能是因为这些，康老对我有意见，有些看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同康老、曹轶欧同志还有联系，请示工作。以后，就断了关系，再没有汇报、请示过工作。这可能使他们觉得我骄傲了，也不请示他们了。以后，他们就同高级党校吴

葆华联系很多，给吴葆华许多指示。”我还说：“康老是很注意这些问题的，我以后要给康老写信，检讨自己。康老注意抓势力，陈伯达不注意这些，是个书呆子。”

1969年7、8月时，听孙蓬一说康老管大学、山东的问题，陈伯达管山西。我就怀疑康老会不会支持我们？曾叫李学文去问，到底北大的问题中央是谁在管？康老管不管北大。

“经验总结”出来以后，我认为宣传队是支一派压一派，怀疑这是康老的指导思想。去江西前，我对宣传队不满，想叫高教部孙世忠出主意怎么办？让赵建文约他到动物园谈话，曾议论了康老。

69年，当宣传队“经验总结”出来以后，因为对提到“宣传队是在校文革扩大化的基础上继续了扩大化的错误……”这句话有意见，我曾同孙蓬一、姜同光、王茂湘议论过康老。我说，康老在延安整风时，就搞了扩大化，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后来，叫毛主席发现了，纠正了。那时康老是中央情报部的，后来调山东去了。

和王、关、戚的关系

1. 1966年10月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的一天晚上，王力、关锋叫中央文革办事处打电话来，主动要来北大看看我，想同我谈谈。我答应了。在北大临湖轩接待他们。他们先对我吹捧了一顿，然后王力说：在中央文革我们是同王任重有斗争的。听说王任重利用孔繁、杨克明反你，我们是同情你的，支持你的。听说张恩慈也从中活动。你把这方面的情况谈谈，王任重到底在北大都搞了些什么鬼？我向他们谈了这方面的情况，并说明天还有两个群众大会，一个是红联军、井冈山召开的会，另一个红旗兵团等组织召开的，我应当持什么态度？关锋说，不能参加红联军、井冈山召开的大会，那些组织中有王任重搞的势力在继续活动。这样，第二天我就没有参加他们的大会，而参加红旗兵团等组织召开的大会，并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台。”由于我这样的行动和我的讲话，使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激化了。

2. 1966年底（记不清具体时间）王力、关锋约我、孙蓬一、李清昆、姜同光等到政协

礼堂小会议室谈话。主要是王任重、孔繁、杨克明、张恩慈的关系。他们准备叫张恩慈回原单位。王力、关锋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张恩慈在北大的所作所为，不代表中央文革。我们也不知道。希望你们把王任重的问題，张恩慈、孔繁、杨克明的问题写个材料。

3. 1967年2月初，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戚本禹召集我、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很关心红代会，派他来同大家谈谈，关于红代会的人员安排。决定聂元梓做组长，其他都是副组长。以后要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又说，市革委会也要准备筹备，现在派周景方帮助谢副总理做事。周是很好的同志，你们以后多同他联系。谢很忙，你们有问题多找周商量。还有杨远，也是学部造反派，很好。你们可以多同他联系。

4. 1967年3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戚本禹找我、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个人在大会堂南门小屋开会，讨论红代会宣言。在会议上戚本禹对我、蒯、韩等进行拉拢，吹我们是群众领袖，并说北京市的红代会实际上是全国的红代会，将来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全国的青年组织，你们是全国的群众领袖，你们是有世界影响的等等。

会议结束以后，戚本禹对我说：“我们对你是有很大希望的。你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贡献。关锋、王力对你都是很好的，你不要对他们有什么误会。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我们都是一致主张你做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市革委会成立，还要你担负更大的责任。你们五个人你要团结好，对其他学校、单位的造反派，不能轻易的说人家是叛徒。吴传启、卢正义、洪涛我们是了解的，他们的历史有点复杂，但都没什么问题。吴传启也是经过许多曲折，斗争出来的。他们的组织都是造反组织，你应该支持。在红代会今后的工作中，你对于群众的活动，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听说红代会准备搬到北大（红代会是3月24日搬到北大来办公的），你还要求派军代表进行军训，这很好。但对于群众的活动，不要过于限制，红卫兵有他们的特点，你要对军代表讲清楚。我说：红代会是各学校调来的学生，我都不认识，也不了解，他们的活动，我怎么能限制呢？中央文革支持的组织，我更不会限制他们的活动，军训的问题，北大还不一定能抽出人来，即使派军代表来，时间也是有限的，

主要抓毛著学习。

5. 有一天在外边开会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得了）见到戚本禹，说到建工学院在中南海西门的活动。戚本禹说：“建工学院新八一、老八一的两个头头都是女将，她们搞的大批判，揪斗刘少奇这个活动，这还是个创造呢。现在不少学校到那里，同她们一块宣传、揭露、批判刘少奇的罪行，效果很好。”我说：“听说是你表态支持的她们的活动，这不是中央首长支持她们，叫她们组织的？”戚本禹说：“你说是不是中央首长支持的？你还要问一问，这么大的群众行动，揪斗刘少奇，这还不应当积极参加吗？北大、清华、北航、师大，你们这几个主要的大学，都应当在大批判中起积极作用。”戚本禹说：“你们北大去了没有？”我说没有。戚本禹说：“当前开展革命大批判。在这里群众要求揪斗刘少奇，批判他的认罪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批判、揭露刘少奇的场所。现在不仅在西门，北门也有不少单位，如果加上周围的群众，十几万几十万人也有了，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影响是很大的。你们几个学校，都应当起积极作用，你们红代会要起作用，不要在这里还分什么天派地派的，都是揪斗刘少奇的，在这个目标下还不一致？！要统一行动。现在刘少奇慌得很，他知道群众揪斗他，不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誓不罢休。他现在感到群众的力量了。”有人说，揪不出来怎么办？戚本禹说：“你们只要在这里坚持下来，毛主席是会答应群众要求的。现在毛主席当然不会一下就叫刘少奇出来的，哪有那么容易，随便来一伙人，要求揪斗刘少奇，毛主席就叫他出来了，交给你们斗他一顿？现在是一个广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是不可能让他出来的。”

和杨成武的关系

过去不认识杨成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央文革召开的接见会上，认识了他。但一直没有谈过什么话，见面就是打个招呼。因为他是代总长，校文革的简报、动态报、新北大校刊等经常送给他，直到杨成武被揪出以后才停止。这都是通过校文革的机要交通送的。我自己没有给他送过。

文革前，一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在北大上学。杨成武找过崔雄昆，要他负责过问这件事。崔雄昆也到过杨成武的家。

汉中问题和杨成武有几种联系：

1967年5~6月，周培源、戴新民在汉中支持“矿临统”这一派。周培源从汉中回来后，不止一次到军委文革汇报汉中情况。以后“矿临统”的一些头头和周培源还有联系。也让他向军委文革送过材料。当时，周培源到军委文革还告诉我，但送些什么材料，我没有看过。到军委是向杨成武还是肖华，还是什么人，我没有过问过。

1967年6月，崔雄昆到过汉中，对汉中的情况也了解，所以何逸堂提出要崔雄昆去找杨成武，并要我写一封信，介绍崔雄昆的情况，否则杨成武不愿接见。我给杨成武写了一封信，说明崔雄昆是革命干部，表现很好，文化革命中没有什么问题。

1967年7、8月以后，我同何逸堂、崔雄昆、还有一位助教（物理系或技术物理系的），四个人一块去找过杨成武并送了材料。替崔雄昆写过一封信给杨成武，要崔雄昆去找杨成武反映汉中问题，但他没在，信给杨成武留下了。

1968年3月处理井冈山兵团115小报的问题，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室，参加的人有谢副总理、汪东兴、丁国钰、李钟奇、杨成武。杨成武在这个会议上没讲几句话，主要谈的是怎样处理的意见。我没有听出来什么问题，所以也记不起来他说了什么话。是不是这次杨成武讲了什么坏话？由于谢副总理、汪东兴对中央斗争的事有了解，所以杨成武一说什么，就听出问题了。我的觉悟低，没有听出问题。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反林彪问题

1. 1967年5月13日，在展览馆剧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受到“冲派”的冲击。林彪发表支持演出的讲话。在513演出的现场，新北大公社文艺团的曹广志表态支持“三军”，由于曹广志在现场是以新北大的名义表态的，冲派的许多单位指责北大。新北大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支持“冲派”。大约5月24日，我、外联组的两

人加上胡宗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见冲派的“星火燎原”，目的是和解，保持友好关系。因为校内有不同的意见，我采取了同等对待的方针。在“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大会上，对两派都发了请贴。在发请贴之前和“三军”派打招呼，他们同意北大的做法。当“冲派”来到“五四”运动场时，看到“三军”也在会场，就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于是新北大公社和“冲派”的关系就断了。在审查时，专案组说“林副主席已经讲话，你也知道，为什么还要去，这不是公开对抗林副主席吗？”

2. “九大”会议后，在军博旁边和我家里，我对一些人说了党的机密。当谈到接班人的时候。我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理想的接班人。但就是身体不好。毛主席红光满面，太阳晒得黑黑的，健康得很。而林副主席脸色不好，苍白。林副主席在战争年代受伤太多了。在苏联养伤，还在那里放过羊。回来以后还病了几年。还说林副主席在九大讲话的时候激动地哭了。”把林副主席这些情况，泄露给周围的人，损害了林副主席的威望和尊严。

3. 为反井冈山 115 小报，也整了材料，也泄露了林副主席家庭情况。（为林豆豆的话题议论林副主席。）

4. 1968 年秋，李学文告诉我，他见到了林豆豆和刘平平。他谈了对学校宣传队的一些意见。认为宣传队“支一派，压一派”对新北大公社不好。林豆豆听了以后说：你们是市革委会的钉子，当然要拔掉你们了。这话我同孙蓬一、姜同光、王茂湘议论过。还同赵建文、孙世忠也议论过。议论“钉子”是什么意思？有的说不清楚，有的说，当然是坏意思了。因为你们反谢副总理就是向市革委会夺权。这还不是“钉子”，当然要拔掉了。我说，我们要重视林豆豆的话，因为她的年岁大了。同时这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看法？林豆豆讲这话，不一定是她自己的看法。谢副总理会不会给林副主席说我们的坏话，所以林副主席会对我们有这样的看法。

全校的坦白大会

1971 年 3 月 4 日在办公楼礼堂，迟群们召开自首坦白大会。我坐在第一排。牛辉林第

一个上台发言：“在洪涛的介绍下，我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并且发展了你们。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五·一六”集团。今天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你们不要抱有幻想，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你们快坦白吧。”他坦白的另外两个问题是：“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指使下，在北大挑动武斗；说了江青的坏话。”另一位井冈山方面的人上台坦白，牛辉林发展他成为“五·一六”，他坦白的内容，主要是忆苦思甜，对不住党的培养。公社方面的方洗德上台坦白，说在我的指使下，整了总理的黑材料。没有说整了什么、我怎么指使的。他是第二战斗队的，已归中央专案组管，与我没有关系。

北大根本没有“五·一六”。牛辉林等人的“坦白”，纯粹是工军宣队导演的闹剧。

清查“五·一六”运动给我的结论

1973年3月，北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结束，我和孙蓬一都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73年）3月1日 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对聂元梓从1970年11月开始审查，现基本查清。主要有五大罪行：

（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从1967年开始就反对周总理；（二）反军乱军；（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四）策划武斗，残杀群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五）破坏九大路线，反对党中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总理；（二）伙同聂元梓反对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报市革委会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